

人類發展報告 與 人類發展指數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林德昌 編著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編印

人類發展報告與人類發展指數：發展的困境與挑戰

林德昌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目次

主委序

編者的話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聯合國與發展議題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人類發展議題的演變

第三節 國家經濟發展結構

第四節 千年發展目標與人類發展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人類發展的困境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經濟增長的失敗

第三節 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傳播

第四節 全球收入的不平等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人類發展的弱點與能力分析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分析架構的建立

第三節 弱點的分析

第四節 能力的建構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統計數字：蒐集與分析的問題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統計數據的問題

第三節 測量收入貧困的問題

第四節 最優先國家和高度優先國家的界定

第五節 小結

第六章 人類發展指數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人類發展指數：概念的操作化與計算過程

第三節 人類貧困指數

第四節 性別發展指數

第五節 性別賦權標準

第六節 小結

第七章 人類發展指數與國家分類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人類發展指數國家排名

第三節 人類貧困指數與發展中國家排名

第四節 性別發展指數與國家排名

第五節 性別賦權標準與國家排名

第六節 小結

第八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序

在過去卅餘年來，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無論在外匯存底、經濟成長率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已然成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典範。儘管台灣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層面上，由於北京的打壓與封鎖，使得台灣在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上，尤其是在推動重返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方面，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無法與我國雄厚的經濟實力相提並論，然而近十幾年來，台灣民主政治的快速發展，亦已成為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所稱羨的對象。

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情勢有重大的轉變，雖然在現實面上依然不利於我國官方外交的推動；然而，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重議題的出現，卻反而開啓了台灣走向國際社會的一項新契機。目前全世界已逐漸走向全球化(globalization) 與地球村的局面；一種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 的概念，亦已逐漸取代傳統軍事外交對立的現實主義。在國際社會活動的角色，除了傳統的國家與政府之外，還出現了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民間專業團體、跨國企業，以及私人企業家等。國際活動與角色的多元化，以及討論議題的複雜化，使得傳統政府所扮演的外交功能，受到相當大的制約。此一發展趨勢，遂造成在環保、醫療、臭氧層、保育、教育、人道援助、發展合作，以及人權等國際議題的處理上，政府亦必須仰賴或委託民間專業人士或團體進行之。傳統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外交折衝，乃逐漸為民間社會的直接交流而取代。

台灣民主政治的持續深化，造成了公民社會和民間非政府組織的普遍興起。結合民間的力量走向國際社會，乃建立了台灣的一種「全民外交」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試圖藉由民間力量走向國際社會時，卻面臨一項嚴重的問題，即許多國內政府相關機構與民間單位，以及實際從事非營利事業的第三部門從業人員，欠缺對整個國際社會主流價值的了解，也無法深入掌握公民社會的特質，更不了解某些國際組織的實際運作特色，凡此皆使得台灣民間社會喪失了參與國際社會的許多機會。再者，當台灣民間向國際社會推動「全民外交」時，亦普遍遭遇到國際專業人才的不足，以及缺乏對相關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體認，此乃無疑形成台灣民間組織邁向國際社會的一道鴻溝。

有鑑於此，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乃於今年度推動「國際青年人才交流系列叢書編印計畫案」，委託中山大學林德昌所長針對聯合國、歐洲聯盟和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等三個國際性組織，進行其組織架構與功能的編譯、介紹與分析，並強調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國際青年於上述組織機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其次，為了協助國內青年和民間組織，能對聯合國系統有更進一步認識，及對當前各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情勢，有更深層次的了解，本計畫也將針對聯合國

的三項重要文件，即「千禧年宣言」、「廿一世紀議程」和「二〇〇三年人類發展報告」等，進行編譯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本計畫在編譯上列各書的過程中，亦將分別探討國內政府與民間參與這些國際組織或計畫的可能策略，俾建立國內政府和民間對於這些國際組織和議題的正確理解，進而建構出台灣實際參與這些國際組織機構的重要理論與實務基礎。期望本系列叢書的出版，對國內有志從事國際交流之青年及非營利組織有所助益。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鄭麗君

民國 九十四 年 八 月

編者的話

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脫離帝國主義的控制，宣佈成為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在甫獲獨立之際，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無疑就是經濟上的貧窮與落後。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數十年來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大量經濟援助，由於背景和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上的重大差異，使得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發展問題，一直無法獲得妥善的解決。

為了解決人類在歷史上所面臨的此一嚴重問題，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乃開始將發展的定義，重新界定為一種個人生活歷程(individual living process)的強化。易言之，發展應該跳脫出一種總體經濟和數字上的迷思，並建立在對個人生活的實際關切上。一九九〇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首次出版了「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強調發展過程的重心，應置於人類本身的發展之上。此反映出，發展不是一種目標，而是一種個人的實際生活歷程。

儘管透過聯合國每年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已使得國際社會對人類貧窮、不平等、婦女權力、政治自由，以及全球化的衝擊等議題，產生了更多層面的對話；但更重要的是，「人類發展報告」亦揭櫫了所謂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性別發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別賦權標準(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以及人類貧困指數(Human Poverty Index, HPI)等。這些指標的建立，主要在於修正過去人類發展策略的錯誤，並用來觀察與衡量人類發展所面臨的真正困境與難題。因此，根據對這些人類發展指數的觀察，「人類發展報告」乃將各國按其發展的良窳，列出了各國排名。這些國家在人類發展指數上的排序，有助於國際社會了解各國發展、貧困、性別發展和性別賦權的情況。再者，聯合國在公元兩千年所宣佈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亦代表了對人類發展的重視與關切。

根據二〇〇二年的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是零點九零二，在全球排名第廿六位，而中國大陸僅排名在第九十五位。在聯合國的定義中，台灣屬於高度人類發展的國家。二〇〇二年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比其在一九九〇年進步了四名，但卻比二〇〇一年退步了兩名。由於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國際社會表現相當優越，因此為了提升台灣國際形象，政府與民間應該加強對台灣人類發展議題的介紹與分析，使國際社會得以了解台灣的正面發展情況。

在兩岸關係的制約下，台灣如何走向國際社會，或如何與國際社會接軌，一直是政府與民間所共同關切的議題。因此，筆者期望藉著此書的出版，使國人能確實了解當前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並掌握和研究國際社會所重視的發展議題，如人權、永續發展、婦女、青年、就業、醫療和教育等，以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對話，進而有助於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進步形象。

林 德 昌

謹識於
高雄西子灣

第一章 緒論

人類的發展議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獲得獨立以來，經濟的貧窮與落後一直是這些國家所面對的最大困境。爲了協助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西方國家不斷透過對外經濟援助和私人投資，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等，試圖改善這些國家的貧窮與落後。但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推動發展，卻依然使第三世界國家在一九九〇年代之際，仍無法擺脫經濟的困頓，而且有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卻更呈現開倒車的現象。在一九九〇年代，西方國家的政府與民間社會開始試圖探討真正的原因何在。

根據史坦尼蘭(Martin Staniland)教授的研究，這是一種背景與環境層面(level of context)的問題。¹其發現何以西方國家的發展概念無法應用要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主要原因乃在於每一個國家的發展背景與環境皆有所差異。易言之，西方國家的發展概念的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卻反而造成了經濟落後的反效果。根據西方國家的發展理論，發展是可以被建立和操縱的；同時，發展也是一種由發展程度較高者所推動的力量，因此發展不但是可以預測的，而且也必然呈現出直線式的往上發展。但由於這是一種建立在西方國家的文化偏見，因此並不適用於絕大部份的第三世界國家。

此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發展的問題，我們亦可發展西方國家的傳統概念，主要仍是將發展概念建立在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層面上。因此，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發展與成長，其最重要的指標乃係建立在經濟的成長率、個人平均收入、消費、國民總生產額等數字之上。儘管這些統計數字有助於觀察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現況，但其仍無法解釋何以有些第三世界國家，係處在於未發展(underdevelopment)或依賴(dependency)的狀態中。同時，其亦無法解釋出何以這些國家的發展，卻出現了倒退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在引進市場機制，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幾乎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皆造成了城鄉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因此，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呈現高度成長時，卻同時有更多的農村居民，如婦女和兒童等，生活狀況卻是每況愈下。這種因經濟發展所造成的雙元經濟(dual economy)，如何獲得解決？

發展中國家在歷經了數十年的發展後，經濟的依然貧窮與落後，不但解釋了傳統發展概念的失敗，而且也促使西方國家和一些國際組織，開始思索解決之道。在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此一解決方案的探討方向，乃在於如何從傳統的重視國家發展的觀念，轉變到強調如何落實與強化個人的實際生活歷程。易言之，任何的發展概念，若脫離了個人的發展與生活改善，則皆是毫無意義可言。有鑑於

¹ Martin Stanilan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6-69.

此，亦即是於此一國際大環境的變動之下，一九九〇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首次出版了所謂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其目標即是要將發展過程的重心，即經濟辯論、政策和倡議(advocacy)等，均以強調人類本身的發展為主。不可否認的是，此一目標雖然是單純的，但卻是具有重大的意涵：即跳脫以傳統收入概念來評估人類經濟與社會進展的架構。易言之，發展的概念乃是與所有的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發展不是一種目標，而是一種人類個人的實際生活歷程。²

在歷年所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中，皆是以當時重要的發展議題為主，並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政策上的建議。這些人類發展報告不僅提供了極富價值的發展資訊，而且亦提出了實踐發展的手段與方法。例如，迄目前為止，在國家的層面上，已有超過一百廿個國家出版了國家人類發展報告。

人類發展報告是一項具獨立性的報告。由聯合國發展計畫署召集重要的學者、發展專家和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of UNDP)的成員，共同參與、討論與撰寫之。從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〇年間，此一團隊係由巴基斯坦的經濟學家和財政部長哈格(Mahbub ul Haq)，以及高爾(Inge Kaul)所共同領導。當時所關心的議題，主要是以受到國際社會關切的政府經費預算收支為重點，而非直接有關人類的發展問題。在一九九五年，由哈格和法古達帕(Sakiko-Fukuda-Parr)所共同負責；從一九九六年到公元兩千年，由喬利(Richard Jolly)和法古達帕共同領導；最後，從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三年，則係由法古達帕和波薩爾(Nancy Birdsall)負責之。在二〇〇四年，法古達帕先生在歷經十年的主要撰寫作者後，為瓦特金(Kevin Watkins)所取代。瓦特金為這一期人類發展報告的主要撰寫者，也是人類發展辦公室的主任。目前人類發展報告，已有十餘種語言譯本，流傳的國家已然超過一百個以上。

透過每年定期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其已然引起國際社會針對人類貧窮、不平等、婦女權力、政治自由，以及全球化的衝擊等，進行了多層面的公開對話。隨著對人類發展的掌握與了解，公民社會團體和媒體已然逐漸促使國際社會和國家的主要決策者，開始認識到關於婦女貧窮、健康、教育和機會的主要社會指標。因此，人類發展報告乃受到國家領導者、政策決策者、媒體、公民社會團體、學術研究者的重視與使用，並引起了許多重要政策的產生與推動。例如，巴西決定按照人類發展報告的精神，使用六十五億美金針對五千三百萬的人民，進行打擊貧窮運動。同時，日本和南韓在國家的立法方面，亦參考了人類發展報告的性別賦權標準。再者，泰國在策劃國家的科技發展政策時，亦使用了人類發展報告的分析結果。由此可知，人類發展報告的出版與流傳，已經受到國際社會和各國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年度的人類發展報告中，主要是要將人類發展的議題，

² Allan Kaplan,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as a Living Process," in *New Role and Relevance: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ed., by David Lewis and Tina Wallace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2000): 29-38.

脫離僅對總體經濟成長的關切，進而邁向對平等(equity)、永續(sustainability)、生產力(productivity)和賦權(empowerment)等方面的實際關切。例如，人類發展報告的主要註冊商標，即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即是一種試圖取代個人平均所得，作為衡量人類實際生活狀況的重要指標。因此，自從第一次人類發展報告出爐後，有四項人類發展的指數，相繼被發展而出。這四種人類發展指數，分別是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性別發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別賦權標準(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以及人類貧困指數(Human Poverty Index, HPI)等。這些人類發展指標的建立，說明了全球發展政策的重大轉變，尤其是在邁向一個更明確、更寬廣的以人為中心的理論(people-centred approach)。

公元兩千年九月，全球共有一百八十九個國家的領袖，在聯合國所舉辦的千禧年高峰會議上，擬訂了歷史性的「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其中亦制訂出了所謂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試圖解決全球人類在邁向發展進程上，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所遭遇的一些挑戰與困境。為此，「千年發展目標」共揭櫫了八項發展目標，作為國際社會追求人類發展的政策與依據。這些發展目標，茲分別介紹如下

- (一)目標一：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
- (二)目標二：普及初等教育
- (三)目標三：促進性別平等，賦權於婦女
- (四)目標四：減少兒童死亡率
- (五)目標五：改善孕婦健康
- (六)目標六：遏制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瘧疾和其他疾病
- (七)目標七：確保環境的永續性
- (八)目標八：為發展而建立全球夥伴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千年發展目標」的最主要目的，乃是要結合國際社會的力量，解決第三世界國收入不足、普遍饑餓、性別不平等、環境惡化，以及教育機會、醫療保健和乾淨水的缺乏等問題。此外，並號召國際組織、區域性組織、各國政府、地方政府、社區、非政府組織等之間的共同協調與合作。這些目標的設訂，不可否認的，其亦與人類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此顯示出聯合國於此一世紀之交，更強調了人類發展議題的重要性。

為了要強調人類發展議題的重要性，本書首先探討了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並指出了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對這些議題的重視。其次，本書將分析人類發展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在分析與研究人類發展方面的資料和數據問題。最後，本書將討論人類發展指數的計算過程與意涵，並根據此一指數探討與解釋各國的發展程度。在最後的結論中，筆者亦提出了一些建議，作為我國政府與民間的一個努力方向。

第二章 聯合國與發展議題

第一節 前言

本章主要目的，是要協助國內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學習如何了解國際社會的發展議題，尤其是聯合國對此一議題的強調與推動。然後，在了解這些主題的重要性後，不但有助於本國的人類發展，而且亦可進一步提供對其他國家和國民的援助，以追求受援國社會和經濟的永續發展。但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儘管政府和人民皆不斷致力於發展工作，但貧窮依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中，受到災害影響的人民，其數目已有日趨增加的現象。同時，受害於貧窮、糧食不足、健康不良和機會受限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亦已日漸嚴重。多年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關切，亦已日漸制度化與組織化。例如，包括聯合國和國際發展組織等多邊組織，以及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和歐洲北美等地區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皆代表了一種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疾苦關切的重視與制度化。自一九九三年台灣推動重返聯合國運動以來，如何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事務，以及了解聯合國相關組織機構的推動人類發展議題，已成為台灣政府與民間所應重視的課題。

第二節 人類發展議題的演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隨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紛紛獲得獨立，經濟發展的問題一直是這些國家所面對的困境與難題。雖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情況，不如西方工業國家，但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在過去卅餘年來，確實亦已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例如，預期壽命增加了八歲，文盲率下降了百分之廿五，幾乎減少了一半；就東亞地區而言，每日生活不足一美元的人口數目，在一九九〇年代幾乎亦減少了一半。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類的整體發展進程，亦仍然過於緩慢。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而言，一九九〇年代可說是絕望的十年。經濟的衰退與內戰衝突的加劇，使得約五十四個國家的發展情況，比一九九〇年還更為倒退。在廿一個國家中，大部份的民眾，依然處於饑餓的狀態。而且在十四個國家中，有更多的兒童不到五歲即告夭折。同時，有十二個國家的小學入學率，呈現下降的趨勢；更有卅四個國家的預期壽命正在遞減。值得國際社會關切的是，此些人類發展開倒車的現象，實屬異常現象。事實上，人類發展面臨的另外一種危機，乃是廿一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出現了減少的情形。由於人類發展指數所隱含的人類發展潛力，並不容易喪失，因此人類發展指數的降低，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係屬罕見。

就國際社會層面而言，在一九九〇年代人類的發展與進步，主要仍歸因於中

國大陸和印度。由於這兩個國家的發展，方使得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中，有關將收入貧困和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人口，實現了減少一半的目標。但從區域性的角度觀之，依照現有的發展速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預計要到二一四七年，方可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減少貧困目標；同時，亦預計要到二一六五年，才能實現減少兒童死亡率的目標。至於愛滋病和饑餓等問題，在此一地區亦是呈現惡化的趨勢。

由於國際社會仍有如此多的國家，到了二〇一五年依然無法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因此各國所推動的發展政策，勢必要有所改弦更張。根據過去發展的成功經驗，其指出了即使屬於非常貧困的國家，亦有實現發展的可能性。例如，斯里蘭卡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則將預期壽命提升了十二歲。同時，波札那(Botswana)的小學入學率，亦從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四十，進步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九十一。事實上，當前的國際社會擁有著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可以應付和處理人類所面臨的各項發展問題，如傳染病、低生產率、醫療保健、基礎教育，以及乾淨的飲用水等。但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將這些資源和技術，應用在最貧困的人類身上。

第三節 國家經濟發展結構

當前的國際社會共有兩類國家亟需進行變革。第一類屬於所謂的最優先國家(top-priority)和高度優先國家(high-priority)。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水準較低，在實現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上，所表現出來的績效較差。至於第二類國家則是屬於在發展目標進程中表現良好，但仍然有許多貧窮的民眾遭到孤立與隔離。在五十九個最優先和高度優先的國家中，皆未能取得進步與發展，此對於聯合國的追求「千年發展目標」，無疑是一項障礙。因此，國際社會的資源和技術，必須優先集中在這些國家。整體言之，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有如下數端：

(一)收入貧窮：儘管這些國家的貧困率已經很高，但在有數據可查考的六十七個國家中，有卅七個國家的貧困率卻告增加。

(二)饑餓問題：在十九個國家中，每四個人中即有一人以上，係處於挨餓的狀態，且情況已有惡化的趨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廿一個國家的饑餓率正在上升。

(三)生存問題：在一九九〇年代，共有十四個國家的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出現了增長的情勢。同時，更令人驚訝的是，在七個國家中，每四個兒童中幾乎有一個無法活過五歲。

(四)飲用水源：在九個國家中，每四個人中即有一人，無法獲得安全且乾淨的飲用水，且飲水的情況日趨惡化。

(五)衛生設施：在十五個國家中，每四個人中即有一人，無法獲得完善的衛生設施與服務，且情況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一九九〇年代，一百廿五個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人均收入，其增長率不到百分之三。其中，更有五十四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反而呈現了下降的趨勢。在收入遞減的這五十四個國家中，有廿個係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十七個國家地處東歐和中亞；此外，亦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六個國家、亞太地區的六個國家，以及五個阿拉伯國家。這五十四個國家都是屬於國際社會需要優先關切的對象。

但對第二類國家而言，則經常為世人所遺忘。這些國家雖然已獲得相當的進展，但在發展的進程中所衍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差異性，如在男女之間、不同的種族和宗教之間，以及在城鄉之間，卻有日趨擴大的情況。為了要了解此一差距問題的本質，則必須要深入了解全國平均數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所在。易言之，對某些國家而言，儘管其出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但由於發展不均衡的影響，遂亦惡化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於廣大貧窮的農人和婦女而言，快速的經濟成長數字是毫無意義的。因此，許多學者乃強調發展議題，應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當個人的生活無法獲得改善時，任何的經濟成長數字都是虛假的。因此，雖然有許多國家的全國經濟平均數，顯示了發展的進程，但貧困的人口依然未減。中國大陸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所推動的扶貧政策，雖然改善了一億五千萬的貧困人口的生活，但這些人口主要皆集中在沿海地區。在西部和西南部省區，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貧困農村存在。

對聯合國而言，相關經濟發展數字的改善，雖然有助於「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但卻不符合「千年發展目標」的具體精神。婦女、農民、少數民族、弱勢團體，以及其他貧困人口達到具體發展目標的速度，經常遠落於全國平均數之後甚多。因此，儘管某些國家在整體上達到了「千年發展目標」，但由於貧富差距的問題依然存在，使得這些國家依然成為國際社會所需重視的焦點所在。

如上所述，許多的發展中國家依然面對著嚴峻的發展問題，因此國際社會應該將有限的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在最需要協助發展的國家。根據聯合國的觀點，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倘無法獲得改善，則其必然成為追求「千年發展目標」的一大障礙。有鑑於此，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乃提出了所謂的「千年發展公約」(Millennium Development Compact)。該公約指出，為了要實現永續發展與成長，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必須要在治理結構、衛生保健、教育、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完成基本需求，否則各國將會持續面臨貧窮的問題。

許多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國家，正在致力於推動這些基本目標的達成。然而在努力的過程中，這些國家仍面臨一些結構性的障礙。這些障礙包括了積欠了鉅額的外債，以及國際市場的關稅壁壘。因此，在面對本國進出口貿易能力的不足與受限，使得這些國家無法賺取大量的外匯，進而無能力支付龐大的利息。此外，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另一項障礙，乃源自於政府的政策與地理條件。一般而言，這些國家擁有貧脊的土壤、易受到氣候和自然災害的衝擊與影響，以及傳染病的肆虐等。儘管上述地理因素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但政府若能推動適當與合理的政

策，則皆有獲得改善的可能性。

爲了解決這些屬於結構性的障礙，則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似可在下列各方面，擬訂與執行相關政策，以解決人類所面對的貧窮問題。

(一)關切並投資人類發展，支持性別平等，投資並重視基礎教育、營養、飲水和衛生保健，基本上這些因素皆屬於推動經濟永續成長的前提條件；反之，經濟發展的增長，必然亦有助於提高人類的就業機會與增加收入，並更進一步激勵教育和衛生保健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投資於人類發展，乃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由於人類發展的目標，主要在於強化人類的健康和教育機會。因此，在這些領域內的投資，實有助於推動個人活動的開展，並加強社區的建構與發展。一旦個人有了基本的活動能力後，發展中國家倘能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資源支持，則亦必然有助於衛生保健、營養、教育、飲水等公共投資的重大提升。

(二)提高農民的生產率，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根據估計，全球最貧困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係居住在農村地區，主要以農業爲生。基本上，農村生產率的提升，可以透過技術的引進與改良，如優良種子的引進、防止蟲害、土壤管理，以及輪作制度等。此外，透過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如建設灌溉系統、儲藏，以及交通運輸等。從農民的層面而言，爲了提高農業生產率，亦可藉由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保障等方式爲之。

(三)投資與改善基礎建設，如港口、公路、電力和通訊系統，以減少經營成本，並克服空間上的地理障礙。在內陸和山地國家，由於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交通運輸成本大增，遂使得經濟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性。因此，針對這些發展中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實有助於該些國家的經濟起飛和發展。反之，由於無力於基礎建設的開發，乃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無法獲得重大的突破。

(四)各國政府應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鼓勵與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加強貿易出口的多元化與多樣化。易言之，透過特定產業發展政策的擬訂與執行，亦可以對非傳統性的商業活動，創造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發展，即是透過了適當產業政策的推動。這些產業政策，包括了出口加工區、經濟特區、科學工業園區、投資稅收優惠、加強研發，以及基礎建設的強化等。由此觀之，對於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而言，若欠缺上述相關產業政策的制定，即難以在其經濟發展方面獲得突破。綜觀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處境，則似可從小額貸款、中小企業的經營與管理等方面著手，藉以激勵人民的生產活動力。

(五)推動民主治理與人權，以消除歧視，保障社會的公正性，強化所有民眾的公平與福利。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貧困人口、少數民族、婦女，以及其他社會弱勢團體等，仍然無法獲得公共服務。同時，於此一環境之下，更無個人活動與成長的空間。因此，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開始成長時，這些個人亦無法從中獲得利益。有鑑於此，如何推動每一位貧窮人士，皆能親自參與他們自己的生活決策，並保護這些弱勢團體不致獲得外在的迫害，乃成爲政府所必須努力的重要課題。爲了要使個人得以共同參與生活的決策，則各國政府在制訂「千年發展目標」之策略時，則必須要先能提升婦女的受教育機會與權利、生育健康權、土地

使用權，以及勞動參與權等。此外，對於種族、部落或地區性的歧視，亦均須排除之，否則將使貧困的窮人處於社會的邊緣地帶。透過治理結構的改革，進一步深化民主的進程，必然有助於增加窮人在生活決策上的發言權。

(六)推動與確保環境的永續發展，加強城市開發的有效管理，並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追求適當的平衡點。在許多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經常面臨了最惡劣的氣候變化。此外，在許多低收入和人類發展指數低的國家，人口的迅速成長，以及商業活動的擴展，亦皆使得環境生態系統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森林的濫墾，以及城市面積的擴張，亦導致了耕地面積的減少，以及水土保持的破壞。因此，如何保障人類的公共健康，以及充份獲得土地、住房、交通、安全與清潔的飲用水、衛生設施，以及其他基礎設施，乃成為發展與環保相互結合的重要政策。

第四節 千年發展目標與人類發展

公元二千年九月，全球各國領袖共同參與聯合國千年高峰會議，推動國際發展合作，為實現和平、人權、民主、治理、環境的永續發展、消除貧困，以及促進人類的尊嚴、平等和公正等原則而努力。同時，全球一百八十九個國家的領袖，亦簽署了「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提出要採取集體行動，以消除許多人類所仍面對的貧窮問題與困境，並制訂在二〇一五年要實現這些人類發展的目標。於此之際，聯合國大會亦制訂了實現上述承諾的「千年發展目標」，其中包括了八項大目標，十八個具體目標，以及四十八個指標。根據「千年發展目標」，其明確只指出要消除貧窮，必須要透過發展中國家本身的努力與合作，以及援助國家的不斷提供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千年發展目標」針對的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國際社會主要關注的重點，在於總體經濟的發展與成長。但「千年發展目標」所關切的重點，卻在於人類的福祉，以及消滅貧困之上。因此，「千年發展目標」所根據的指導價值，乃在於自由、平等、團結、寬容、尊重自然，以及責任的共同承擔等。

(一)自由：人類不管其性別為何，皆有權利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免於饑餓、暴力、壓迫和恐懼的威脅。根據人類本身的意願所進行的民主參與和治理，無疑能強化上述權利的保障。

(二)平等：任何人類和民族，皆不能被剝奪從發展中獲益的機會；任何人類不管其性別為何，皆必須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三)團結：為了要應付全球所面臨的挑戰，國際社會必須按照平等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公平的分擔成本和負擔。受害者或獲益最少的人類和國家，必須得到來自獲益最大者的援助。

(四)寬容：在信仰、文化和語言多樣化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應該獲得相互的尊重。對於社會內部的差異性，不但不應加以壓制，而且也應該加以保障。為

此，國際社會應加強在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間的和平與對話。

(五)尊重自然：依照永續發展的目標，審慎管理所有生物物種和自然的資源。只有如此才能將自然賦與人類的無限資源，留給下一代。對於那些無法採取永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則必須要加以改變。

(六)責任的共同承擔：管理全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面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和平獲得威脅，世界各國必須採取共同的責任。作為全球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國際性組織，聯合國必須發揮核心作用。

人類發展主要關切的是人民，並強調人民在自由和尊嚴中的生活選擇權。經濟成長、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增加，以及技術的進步等，雖然對於改善人類的生活是相的重要，但這些僅是手段而非目的。擴大人類的生活選擇權利，首先乃是要強化人類本身的能力。人類發展的最基本能力，乃是健康長壽、受教育、達到體面生活的標準，以及享有參與社區生活的政治和公民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種人類的能力，皆被納入了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中。雖然「千年發展目標」有助於實現這些能力，但其卻無法反映人類發展的所有重要層面。

有鑑於此，聯合國發展計畫署透過其每年所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強調發展的目的，即是要透過擴大選擇、自由和尊嚴等原則，以改善人類的生活。貧困並非僅源自於收入的匱乏，同時也包括缺乏享受完整的、有創造性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例如，當人類遭受健康不良的困擾、無法參與社區的生活決策，以及無法選擇本身的生活方式和權利時，此即是人類生活基本能力的喪失。此一權利被剝奪所產生的貧困，與因收入缺乏而導致的貧困，顯然有相當大的差異。雖然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是要消除上述制約人類選擇能力的束縛，但其卻無法包含所有人類發展的重要方面。「千年發展目標」並未涉及人類參與影響本身生活的決策，或提高本身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聯合國「千年宣言」中，民主與人權卻是其重要的組成部份。

表 1：人類發展目標與千年發展目標的對照

人類發展的核心能力	千年發展目標
健康長壽	目標 4、5、6：減少兒童死亡率；改善孕婦和產婦健康；防治主要疾病。
受教育	目標 2、3：普及初等教育；促進性別平等；賦權於婦女。
體面的生活	目標 1：減少貧困和饑餓
享有參與社區生活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	「千年發展目標」中無此項，但其卻是「千禧年宣言」中的一項重要全球性目標。
人類發展的必需條件	千年發展目標
環境的永續性	目標 7：保證環境的永續性

公平、性別平等	目標 8：促進性別平等，賦權於婦女
確保全球經濟環境	目標 8：加強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UNDP, 200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儘管「千年發展目標」的推動，已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好評，而且在消除人類貧困方面亦獲致了相當的進展。但不可否認的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亦有其缺點存在：

(一)範圍過於狹隘，忽略了有力的治理、增加就業、改善生育健康，以及全球治理的制度改革等優先發展的目標。

(二)所依賴的指標令人質疑，如透過入學率的差距，來衡量性別平等；以電話的使用量，衡量獲得技術的程度等。

(三)對於那些未能實現發展目標的國家進行點名和羞辱，此妨礙了某些國家推動發展的積極性。

(四)扭曲了各國發展的優先順序。發展議程的制訂，乃是經常由援助國所決定，而且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此一方式，阻礙了受援國家政府和社區的共同參與。由於援助國無法根據具體情況擬訂受援國的優先順序，此乃有害於受援國的真正發展。

這些缺點指出了，倘「千年發展目標」在定量的指標方面，與實際情況相脫離，僅是為目標而確定目標，而非為了衡量實現減少人類貧困的進步，則必然會產生問題。儘管「千年發展目標」反映了全球重要發展目標的共識，但各國在制訂本身的發展策略時，亦必須強調其本身的特殊優先順序。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要實現各國的發展需要，其目的應該在於如何動員不同層面的力量，而非點名和羞辱那些無法達到特定目標的國家。基本上，一個愈貧窮的國家，其所面對的挑戰就愈大。例如，馬里必須到了二〇一五年時，將貧困率減少一半，達到百分之卅六；將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減少三分之二，即每一千人中死亡八十五人。在與馬里相比較下，斯里蘭卡必須將貧困率減少到百分之三點三；將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降到每一千人中有八人。此一比較並非意指馬里一定會失敗，而是說明了最貧窮國家所面臨的更大挑戰，必須要獲得更多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切和支援。再者，國際社會亦不應該僅依賴是否按時實現目標，以決定和判斷是否成功或失敗。但在二〇一五年時，將貧窮減半並非是最後的目標，因為各國必須按此一比例，持續推動減少貧困。因此，未按時達成目標的國家，是不應該受到責難的。

第五節 小結

自世紀之交以來，聯合國所推動的千禧年宣言和千年發展目標，其主要目

的無非在於解決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並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計畫。對聯合國所推動的發展議題而言，若無建立在個人生活的實際層面上，則任何國家的總體發展都是無意義的。此外，爲了要徹底解決人類發展的問題，聯合國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即已不斷強調國際社會、區域組織、國家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等的共同合作與協調。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在災難反應，以及在實際執行人類的發展計畫中，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組織的特色，主要在易於接近地方民眾，對於地方貧困的了解優於官方政府。³多數的民眾相信，透過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必然真正有助於地方的實際發展。但是，許多學者和非政府組織亦認爲，在人道援助和發展工作之間，確實仍有鴻溝存在。易言之，經由人道援助的方式，以進行災難的回應，不但並未有助於長期的發展(long-term development)，反而經常有害於發展。例如，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人道救援，其目的主要在於使「萬事萬物歸於正常」(getting things back to normal)。⁴因此，近幾年來，由於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全球人道援助，已呈現大幅度的成長，故如何重新設計人道救援計畫，不但可滿足受害民眾的立即需要，更能使其符合長期的發展目標，已然成爲當務之急。

³ Stephen D. Biggs and Arthur D. Neame, "Negotiating Room to Maneuver: Reflections Concerning NGO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New Policy Agenda," in *Beyond the Magic Bullet: NG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1996), 43.

⁴ Mary B. Anderson & Peter J. Woodrow, *Rising From The Ash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imes of Disast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2.

第三章 人類發展的困境

第一節 前言

對人類的發展而言，一九九〇年代可以說是最好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最壞的時代。有一些地區和國家已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卻亦有其他地區和國家，不但面臨發展的停滯不前，而且更呈現出倒退的情況。此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開倒車的情況，不僅表現在「千年發展目標」的具體目標上，亦體現在人類發展指數上。人類發展指數，乃是衡量人類發展核心內容的總體性標準。大體而言，由於人類發展指數的兩項核心內容，即識字率和入學率的提升，需要相當的時間發展，因此人類發展指數雖然上升的幅度緩慢，但卻經常呈現穩定上升的局面。但是當我們觀察到人類發展指數，反而出現下降趨勢時，即預示著人類發展危機的來臨。

儘管人類的平均收入，經常隨著時間而有所波動，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發展是呈現持續改善的情勢。但是在一九九〇年代，有些發展中國家遭遇到了發展停滯與惡化的局面。共有廿一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出現了下滑的趨勢。由於其中有許多國家缺乏足夠的數據，計算其在一九九〇年之前的人類發展指數，因此我們亦無法了解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是否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出現了倒退的情況。在具有一九八〇年以後數據的一百一十四個國家中，只有四個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人類發展指數，出現了下降的情勢。⁵在一九九〇年代，則有十五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也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⁶造成一九九〇年代人類發展指數倒退的原因，主要可歸因於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的傳染，其降低了人類的預期壽命，並導致人類收入的大幅度減少。有鑑於此，本章乃針對當前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困境，作深入之分析與探討，俾供國內政府與民間相關組織參考。

第二節 經濟增長的失敗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影響人類發展指數緩慢成長和人類發展貧困的主要因素，依然在於經濟成長的失敗。基本上，在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也是減少收入貧困最大的地區。但是在經濟成長的提升，亦並非絕對能造成收入貧困的減少。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印尼、波蘭和斯里蘭卡，雖然可以觀察到經濟的成長，但收入貧困的人口數目卻告增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倘要將人民每日一美

⁵ 這四個國家，分別為剛果民主共和國、蓋亞那、盧安達，以及尚比亞等。

⁶ 這十五個國家，分別為亞美尼亞、白俄羅斯、波札那、布隆地、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哈薩克斯坦、肯亞、賴索托、俄羅斯聯邦、南非、史瓦濟蘭、塔吉克斯坦、坦尚尼亞、烏克蘭、尚比亞、辛巴威、科特迪瓦，以及摩爾多瓦等國家。

元的生活水平，增加到二美元，則年經濟成長率至少需要百分之三或更多。然而在具有數據的一百五十五個國家中，僅有卅個國家的年人均收入增加率，在一九九〇年代超過了百分之三。在其餘的五十四個國家中，其平均收入下降了；而七十一個國家的年均收入增長率，則亦不到百分之三。

經濟發展的緩慢，導致國際社會在千禧年之交，共約有十二億的人口，爲了每日一美元的生活費而奮鬥；而每日生活費用不足二美元的人口數量，更是上述數字的兩倍。但令人驚訝的是，若轉換成本國貨幣，則每日一美元的生活費，並非意指能購買當地一美元的物品。由於每日一美元的貧困線，乃係由世界銀行所提出的，但因其在計算的過程中，缺乏嚴謹的定義，故其有效性經常引起質疑。但無論如何，此一數據仍說明了全球每日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從一九九〇年的百分之廿九點六，下降到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廿三點二。⁷但就整體情況而言，雖然有許多國家獲得了改善，但也有許多國家的情況更爲惡化。

此外，在六十七個具有數據的國家中，有卅七個國家的貧困率，在一九九〇年代呈現了更嚴重的情況。但在巴西、智利、印度、烏干達、泰國和越南等國家，卻是大幅度降低了貧困率。在貧困率激增的國家，主要是來自東歐和中亞地區。其他貧困率惡化的國家，尚包含了阿爾及利亞、蒙古、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委內瑞拉和辛巴威等。最後，當人口增長時，貧困人口比例的減少，依然可能意謂著貧困人口數量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東亞地區，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在一九九〇年代呈現了大幅度的減少。主要減少的動力，係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成長。在南亞地區，大約有五千萬的貧困人口，此一數字多年來皆維持不變。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其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則新增加了七千四百萬的極端貧困人口，此相當於菲律賓的人口數目。在東歐和中亞等地區，貧困人口的數字，則由三千一百萬增加到了一億多。

第三節 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傳播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人類面臨最大的衝擊者，乃是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傳播和肆虐。最早的愛滋病例，係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初期。到了一九九〇年，已大約有一千萬人感染了愛滋病。根據二〇〇二年的統計資料，感染愛滋病的病例，已達四千二百萬人之多。此一疾病，已經導致二千二百萬人死亡，並有一千三百萬兒童，於甫出生之際即成爲了孤兒。⁸愛滋病對情況最嚴重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之影響，乃是降低了該國的預期壽命。但此一疾病影響不僅是生命，而且亦導致了青壯年的死亡，或者使其喪失勞動力。因此，愛滋病的傳染，亦足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目前非洲許多國家，正遭受愛滋病的重大衝擊。在波札那、賴索托、史瓦濟

⁷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3).

⁸ UNAIDS, *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Geneva [http://www.unaids.org/epidemic_update/report_july02/index.html], March 2003.

蘭和辛巴威等國家，每三個成年人中，即有一個人以上被感染。在納米比亞、南非和尚比亞，成年人的感染率為五比一。其他有十九個國家的此一比率，則高達了廿比一。在一九九八年，尚比亞有一千三百名的教師死於愛滋病，高佔該行業每年培養人員的三分之二。⁹長此以往，到了二〇二〇年，受到打擊最大的非洲國家，可能將喪失四分之一以上的勞動力。¹⁰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國家，烏干達是唯一將愛滋病減少了一半，而且也是在危機時刻，扭轉了傳染趨勢的國家。在尚比亞，年輕婦女中的愛滋病帶原者，其比例在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間，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此使尚比亞有希望成為非洲地區第二個改善最大的國家。塞內加爾也是另一個成功的案例。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情況，則依然面臨愛滋病的困境。在喀麥隆和奈及利亞，儘管愛滋病感染率一向很穩定，但是近幾年來已呈現提高的趨勢。在一項有關愛滋病的調查報告中，被調查的年輕人中有一半不知道表面健康的人，亦可能感染到了愛滋病或愛滋病毒。同時，世界上只有約百分七的人類，使用保險套進行避孕措施。¹¹

雖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愛滋病和愛滋病毒患者，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但此一疾病正在其他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與影響。在加勒比海地區，大約有五十萬人被感染；在東亞地區，以及東歐、中亞等地區，分別各有一百廿萬人被感染。拉丁美洲有一百五十萬人，南亞地區則有六百萬人被感染。根據估計，到了二〇二五年，中國大陸感染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病例，可能高達七千萬人；而印度亦將可能高達一億一千萬人之多。此外，在估計預期壽命的減少方面，中國大陸將減少八歲，而印度將減少十三歲。¹²

第四節 全球收入的不平等

在論及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時，儘管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定義，但對多數人而言，人類之間收入不平等的情況，正在擴大與惡化。全世界人口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基尼係數約為零點六六，比起收入最不平等的巴西(基尼係數為零點六一)更為嚴重。¹³由此觀之，全球最富裕人口的百分之五，其收入是最貧困百分之五人口的一百一十四倍。再者，百分之一最富裕人口的收入，等於最貧困百分之五十七人口的收入。同時，二千五百萬最富裕的美國人收入，與全球廿億貧困人口的

⁹ UNAIDS, 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Geneva [http://www.unaids.org/epidemic_update/report/index.html], March 2003.

¹⁰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Impact of HIV/AIDS on Food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1 May, 2001, Rome.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3/Y0310E.htm]. March 2003.

¹¹ UN,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Data and Trends 2002." Report prepared by Interagency Expert Group on MDG Indicators, 2002, New York.

¹² Nicholas Eberstadt, "The Future of AIDS."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2002).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21101faessay9990/Nicholas-eberstadt/the-future-of-aids.html].

¹³ 基尼係數乃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標，從 0 到 1，分別表示完全平等和徹底的平等。

總收入，呈現大致相等的局面。¹⁴

對於國際社會收入與分配不平等的現象，必須加以關切與注意，並應致力於為更多的貧困人類帶來更多的收入機會，而且也可以減少極度收入不平等地區的社會動亂與磨擦。隨著全球化的加深，以及資訊網絡的愈來愈普遍，人類對於全球不平等的現象亦開始有所了解。因此，人類不再僅與本國的同胞相比較，且其亦開始意識到國與國之間的重大差異性。由於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不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發展，故如何改善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實有其必要性。

由於分析方法的差異，因此造成了相關世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結果，均產生了不同的結論。一般而言，分析與衡量人類收入的不平等，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面著手。

(一)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

國際間的不平等，主要係透過比較各國國民的人均收入來加以衡量的。在十九世紀初期，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目前依然是屬於最富裕的國家的範疇。此一現象說明了國際不平等結構的持續性。在一八二〇年，西歐國家的人均收入，乃是非洲國家人民的二點九倍。在一九九二年，此一差距擴大到十三點二倍。¹⁵同時，在一九九〇年代，擁有高收入的西方工業國家，雖然在人均收入的增長方面，呈現了緩慢的腳步，但此一趨勢卻是穩定的。相對於中東歐和中亞的一些正處於轉型期的國家，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等，經濟發展卻出現了停滯的現象。但在印度和中國大陸，卻又出現了經濟的快速成長與發展。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了西方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存在著穩健的成長趨勢。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則顯得相當的複雜。然而，當在衡量收入不平等時，若將人口因素亦考慮進去，則發展中國家各國的平均收入，似乎亦在朝向趨同的方向。

(二)世界人口之間的不平等

有一些研究亦試圖對造成全球不平等的原因，進行探討與分析。比較全球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即意謂著在不考慮國界的情況下，收入在所有人類中的分配情形。當我們使用此一方法來進行研究時，發現了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三年間有了明顯的擴大。造成擴大的主要動力，係因擁有眾多農村人口的亞洲國家的農村收入，呈現了增長緩慢的情勢。而同時西方工業國家的人均收入，卻又呈現穩定的成長。因此，全球人類的貧富差距正處於擴大的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研究根據的是購買力平價比率，其無法正確的反映國際價格上的差異。

此外，亦有其他的學者採用不同的方法，但其所獲得的研究結果，卻是較為樂觀的顯示出全球個人收入趨勢相同。在一九九五年的個人收入差距，已經回復到一九五〇年的水準。¹⁶造成這些不同的研究結果與爭論，主要仍在於所採取的

¹⁴ Branko Milanovic,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no 476 (2002): 51-92.

¹⁵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um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http://www.theworldeconomy.org/about.htm>].

¹⁶ David Dollar and Aart Kraay, "Spreading the Wealth,"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1 (2002):

研究與測量方法有所差異。當使用基尼係數作為單一總括性的指標測量時，個人收入似乎呈現趨同的方向。此乃是因為在建構基尼係數時，給予中等收入人民的權重較大，而貧富兩個極端則是權重較小。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年來在全球貧富之間的差距，仍然持續的擴大。

(三)國家內部人民的不平等

國內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以國家層面作為分析的對象。此種方式，適合於探討與分析國家政策，與收入分配的關聯性何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收入的不平等一直在擴大。同時，有很多的研究一直試圖探討，各個國家收入分配的發展趨勢。¹⁷根據資料統計，在擁有相關數據的七十三個國家中，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共有四十二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出現了增加的現象。在卅三個發展中國家的個案研究中，只有六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現了日漸縮小的情形，而另外有十七個國家卻是擴大了收入不平等。易言之，在單一國家的層面而言，資產和資源的控制權，不斷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此乃不爭之事實。雖然並非所有國家的發展皆如此，但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債務危機中，許多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開始擴大。¹⁸此後，此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趨勢，可見諸於東歐國家、中亞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國家。一個國家內部收入差異的擴增，不但將影響到人類的發展，而且亦會衝擊到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此實值得各國政府的注意。

第五節 小結

在本章的討論出，列舉了人類發展所面臨的障礙與困境，如經濟增長的失敗、愛滋病的傳染，以及全球收入的不平等。人類發展所面對的這些問題，不但使得西方國家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發展中國家所積極推動的發展，遭遇到了失敗，而且亦使得許多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更呈現出倒退的現象。在此，值得國際社會思考的是，何以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命運不如西方工業國家？何以愛滋病、環境惡化、收入不平等和不均衡發展，會不斷的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發展難題乃是相互影響的，其必然無法脫離其他因素而存在。例如，愛滋病的問題，不但影響了一個國家內部的勞動力，而且更多說明了該國醫療衛生的落後，以及教育機會的嚴重欠缺。此外，經濟發展的落後，不但造成了科技發展的落伍，且亦影響到了該國環境的永續發展。更重要的是，貧窮與落後的問題，不但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頓，而且更造成國內衝突與內戰的頻仍。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所面對的貧窮與落後問題，絕非僅依賴單一的消滅貧窮政策所能解決。如何透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合作，並從不同的議題與層

120-133.

¹⁷ Giovanni Andrea Cornia and Sampsa Kiiski, "Trend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World II period: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2001/89.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2001.

¹⁸ Ravi Kanbur and Nora Lustig, "Why Is Inequality Back on the Age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8 April, 1999. Washington, D.C.

面共同切入，才是解決發展中國家貧窮問題的最佳保障。

第四章 人類發展的弱點與能力分析

第一節 前言

發展中國家在人民發展的過程中，雖然遭遇到許多發展的困境與瓶頸，而造成生活的流離失所，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發展中國家人民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而出的似乎都是屬於一種弱勢的群體。不管其居住的環境與條件為何，每一位人類不但皆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且在生活的奮鬥過程中，每個人不能因為其生活困苦，而認為其生活過程毫無優點可言。對於一個從事發展工作者而言，首先必須要瞭解的是，個人不管在生存的條件與生活的現況為何，其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有其弱點(vulnerability)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亦有優點或能力(capacity)存在。因此，一個真正的發展工作，必須要強調如何強化人類的發展能力，以及如何針對其弱點，提供及時且必要的援助。易言之，即時的援助和發展工作，必須是相互結合的；同時，任何人類發展的弱點與能力，亦必須同時進行探討與分析，如此方能充份掌握發展的真諦。

對各國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而言，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承諾與協助，乃是其最重要的目標。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情勢需要這些非政府組織，回應以立即的人道救援時，發展目標經常遭到遺忘；或至少當緊急援助如火如荼之際，這些發展目標卻遭到延緩。同時，在危機與緊急救援的情況下，對於發展工作的擬訂、評估與實行，皆經常遭到放棄。因此，令人感到沮喪的是，一旦需要立即回應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緊急災難時，這些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經常無法維繫其原先對發展的堅持與執著。「國際救援發展計畫」試圖為這些非政府組織在發生緊急災難時，提供一種不但有助於維持對發展目標的追求，而且也有助於滿足緊急性的立即需要。有鑒於此，弱點和能力分析 (Capac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Analysis) 乃提供了一種架構，以蒐集與整理有關災難情勢的資料，並決定在計畫抉擇與擬訂之間的優先順序。

第二節 分析架構的建立

首先，我們要檢驗的是，非政府組織對有關災難反應的第一項決策為何；易言之，決定是否應該提供援助，以及是否要設計整套的援救計畫；或者要與地方性的非政府組織合作，作為提供人道援助的夥伴。其次，吾人要觀察的是，可能影響這些援助計畫的因素。例如，非政府組織提供援助時，受援國的政治背景為何？在擬訂和執行計畫時，資訊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有那些人需要知道那些事？以及在何時他們需要知道那些事？這些資訊的目的何在？這些資訊如何被應用，以增加援助項目的發展成效？在擬訂援助計畫的層面之下，三個有關的議

題，即速度 (speed)、規模 (size) 和時間 (duration)，需要更進一步的思考。援助項目所要援助的對象為何？參與者 (participants) 是用來描述那些接受援助的受援者，因為只有這些人才是真正致力於發展的參與者。對從事人道援助的非政府組織而言，了解與認知在災難反應和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對於計畫的擬訂和執行是很重要的。

分析架構 (analytical framework) 是一種用來協助非政府組織，設計和評估援助計畫的工具。在比較不同的經驗時，我們很難從每一個情勢的特殊性中，發展出可以同時適應多重形勢的通則 (generalizations)。援助工作是相當的複雜，在國際、國家、區域和地方的層面上，包含了不同的人們、組織機構和政府部門。再者，災難的發生，乃是緣於自然和人為因素，而且可能反應的範圍也是相當的複雜。因此，在設計災難反應的計畫，以及極大化其發展成效時，有許多變數 (variables) 是必須加以考量的。

我們如何能在處理如此複雜和分歧的經驗之同時，依然能找到通則，提供未來援助計畫的擬訂者參考？對於這種複雜且多元經驗的比較，建立一種單純化的分析架構，實有助於此一目標的達成。此一分析架構，可以提供我們考慮有關設計和執行有效援助計畫的重要因素。一個分析架構決定了必需被考慮的問題與變數範圍，並且建議這些變數被考慮的優先次序。質言之，此分析架構有助於我們勾劃出一個複雜的現實環境，突顯重要的變數，以及闡釋重要變數之間的關係。此一分析架構，主要是奠基在「弱點」(vulnerabilities) 和「能力」(capacities) 等兩個概念之上。我們探索「弱點」，是為了要了解為何一個災難會發生在該地區？其影響和衝擊為何？其為什麼會影響到特定的人民團體？以及如何評估未來災難的危險性？

第三節 弱點的分析

於此，當非政府組織在進行人道援助時，對「弱點」和「需要」(needs) 做一項清楚的區分，實有其必要性。「弱點」意指一些長期性的因素，會影響到一個社區回應事件或災難的能力，抑或造成對災難的極度敏感性。「需要」若使用在一個災難的環境中，則意指為了生存或復甦的立即且必要條件。例如，在城市地區受到土石流影響的人們，可能「需要」臨時的庇護所和醫療服務。他們也可能「需要」住房和基礎設施的重建。另一方面，「弱點」包括許多長期的趨勢和因素，其中有一些可能直接導致因土石流引起的痛苦：如人口擁擠、房屋建築在不穩的地基上，以及貧乏的建材等。其他的「弱點」因素，雖然並未直接與因土石流產生的危險有關，但卻影響到整體社區對災難回應，或復甦與重建的能力：例如，由於缺乏農村就業機會，所造成農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政府的缺乏法律強制力和提供服務；缺乏強大的社區組織，以及普遍的貧窮等。

就理論的意涵而言，「弱點」發生在災難之前，影響到災難的嚴重性，並阻礙了有效的災難反應和持續。另一方面，「需要」源自於危機本身，具相當的短

期性特色。許多災難援助的努力，多集中在滿足立即的「需要」，而非調整和減少「弱點」。基本上，「弱點」的分析，有助於避免救援工作的兩項缺點：

(一)懷疑在災後的試圖讓事情回歸正常的作法，因為藉著探討造成災難的因素分析，可以使人們了解可能造成未來災難的「弱點」何在。

(二)其可使從事人道援助工作者，警覺到他們在介入後可能產生的未來「弱點」為何？例如，在地震帶建造高樓大廈，而沒有使用耐震技術，或是在糧食生產地上興建商業和住宅區等皆是。

爲了要避免「弱點」持續增加，則必須要辨識「能力」，爲了是要了解到在一個社會中，對於朝向未來的發展，還具有那些優勢？承認受到災難影響人民的「能力」，對於設計和實行具有發展效果的災難回應是很重要的。對每一個社會而言，其都有優缺點，也有其「能力」和「弱點」。當一個危機變成爲一項災難時，則該社會的「弱點」會變得比「能力」更爲明顯。然而，對於那些想要協助受援國復甦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而言，對於「能力」和「弱點」的了解與認知是重要的。但並非所有的危機，都會變成爲災難；也並不是所有的人民，在災難發生時，所遭受到的苦痛都是相同的。因此，何以災難會在某一特定時刻發生？何以災難會發生在某一特定團體之上？這些答案在於對「弱點」的觀察與檢驗。人們變成災難的犧牲者，只因為他們是有「弱點」的。因為人們具有不同程度的「弱點」，因此他們受到苦痛的程度也會有所差異。

「弱點」最明顯和最可觀察的指標，是身體和物質貧窮 (physical/material poverty)。貧窮的人民，總是比富有的人民更易受到危機的影響。此外，還有兩個有關「弱點」的範疇，也會造成人民的受苦受難。社會/組織領域 (social / organization realm) 指出一個社會如何組成，其內部的衝突，以及社會如何管理這些衝突？另一個是動機/態度領域 (motivational/attitudinal area)，其指出了在社會內部的人民，如何了解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影響本身環境的能力。從這些領域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該社會，是具有「能力」的，還是具有「弱點」的。有些社會雖然貧窮，但卻具有良好的結構與凝聚力，比起那些沒有組織或人民分裂的社會，更能忍受災難的衝擊，也更容易進行災後的重建工作。同理，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或信仰系統的團體，或那些具有成功合作經驗以達成社會目標的人們，當面臨災難時，可能更容易相互幫助，而減少了更多的痛苦。

根據以上之討論，非政府組織在進行對受援國的「弱點」和「能力」分析時，主要是以社區層面爲主，並含蓋下述三個範圍：

(一)身體/物質 (Physical/Material)

身體和物質的範圍，包括了土地、氣候、環境、人民健康、技術和勞力、基層建設、糧食、房舍、資金，以及身體技能等。將身體和物質的因素，列爲第一個討論的原因，並非在於此點是最重要的，而是因爲這是外來人道援助最強調的重點。¹⁹當一個災難發生時，災民身體的受到痛苦和傷害，都是最引起外人重視

¹⁹ 林德昌編著，*人道主義憲章與賑災救助準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民國二〇〇二年），頁一八六。

者。儘管災難的受害者，遭受到糧食、住所和醫藥上的嚴重匱乏，但他們還是會有一些身體和物質的資源留存。這些資源可能是那些可以收回的物品，或他們本身所擁有的技能。這些能力正是建構未來進一步發展工作的基礎。²⁰

(二)社會/組織 (Social/Organization)

爲了要探討社會/組織的弱點和能力，從事災難援助工作者關切的是在災難之前，災民的社會結構爲何？同時，是否這些社會結構在面臨災難時，發揮了服務人民的功能？災難對該社會組織所產生的衝擊爲何？社會/組織的範圍，包括正式的政治結構，以及非正式的體系；人們可以由其中進行決策、建立領導權，或組成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社會內部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或衝突時，社會和組織的弱點就會變得很明顯。因種族、宗教、語言、階級等因素所發生的衝突和分裂，會削弱社會的機制，使人民在面臨危機時更爲脆弱。導因於社會弱點而產生嚴重的災難，主要是戰爭；目前全球共約有數百萬的難民，正遭受這些社會和身體的迫害。另一方面，包括災民在內的人們，總是擁有自我的社會處理體制 (social coping systems)：如家庭、團體、社區或區域性的組織；分配糧食和服務的體制；家庭之間和家庭內部的決策模式。要克服一個災難的努力，必須要承認且建立在這些機制之上。再者，爲了要評估本身的能力，再透過聯合與合作的行動，一個社會也可以建立社區的凝聚力。

(三)動機和態度 (Motivational/Attitudinal)

爲了要了解動機和態度的領域，從事發展工作者關切的是社區如何觀察本身，及其有效處理身體和社會/政治環境的能力。在災難發生前，民眾的信仰和動機爲何？以及災難如何影響到這些人民？人們是否感覺到他們擁有建立本身生活的能力？一個社會的是否有能力重建，或改善其物質基礎或社會組織；於此一範圍上所擁有的優缺點，將會在不同的社會之間產生相當重要的差異性。

當人們覺得被犧牲、相信宿命論或具依賴性的，則一個社區在心理或動機上，是有其弱點存在的。有時，宗教和迷信會強化這些弱點的存在。有時，宗教提供了共同的信仰和凝聚力。在動機和態度的範圍上，有關弱點和能力的指標，根據不同的背景和文化而有所差異。當人們共享相同的目標，或意識到其本身乃是自己的生活和未來的代理者，則他們可以爲自己創建一個更滿意的社區。事實上，一場危機的發生，有時可以看出一個社區的特殊表現。從事人道援助和發展工作的人們，經常注意到在一個災難發生之後，災民更易接受改變，以及考慮採取解決事情的新方法。這種人們擁有能力的感覺，也形成了任何試圖克服災難，以及建構更堅強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基礎。因此，對於任何想要提供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而言，其應該鼓勵和支持這些能力，而不是透過人道救援來破壞災

²⁰爲了要了解身體上的弱點，從事災難援助工作者所關切的問題是，受災難的人民在那一方面是身體上有弱點的。例如，在同屬於受災人民的團體中，是因爲他們的經濟活動(如由於洪水使農民無法耕種，或由於乾旱使游牧民族失去牧草地)，或是因爲他們的地理位置(房子建在洪水區、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地區或易發生颶風地區)？或者，爲了長期的維繫生存，他們僅是單純的太貧窮，或僅擁有稀少的資源？對於這些差異性的認知，對於提升非政府組織提供援助的有效性，實具有相當的助益。

民所具備的這些能力。

第四節 能力的建構

爲了要更符合複雜的實際形勢，以增加非政府組織對受援國「弱點」和「能力」分析的有效性，有五個因素必須列入考量：

(一)性別的差異性

在所有的社會中，男性和女性都扮演著不同的社會和經濟角色。以性別爲基礎的勞力分工，存在於任何傳統或現代的社會。在有些社會中，這些差異是根諸於不同的文化或宗教，而且也形成了一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其他的社會中，改變是快速的，性別的角色是流動的。如果一個人試圖發現支持發展的最好表現方式，則檢驗男性和女性的能力和弱點，是有其必要的。例如，在難民營中，如果沒有女性的存在，則可以發現難民營的管理者難以安排營裡的一些基本生活，如食物的分配和準備，而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婦女所扮演的。²¹在擬訂人道援助計畫時，若無法考慮這些事實，將會遭遇到很多的困難。對此，從事發展工作者，必須要先了解到婦女擁有那些技能和專業？男性擅長處理的範圍和技能爲何？由於，社會和組織結構經常排除了婦女參與的可能性，此必然會使發展工作的進行受到相當的障礙。

(二)其他問題的差異性

對於一個受災社區的分析，也可以從貧富、種族、政治或語言、農村和城市居民等範圍來著手。同時，在社區內部，誰能提供關於弱點和能力情況的重要訊息，以及人們如何受到危機和干預等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誰有管道獲得資源，或誰能控制資源？而誰沒有？誰代表了社區的社會結構，而誰又被忽略了？誰懷有共同的態度，而誰又沒有？以實際的例子來看，一個從事人道援助的非政府組織，被要求對衣索比亞的某一個省，提供緊急糧食分配服務。但該非政府組織很快的發現其面對著三個不同團體的人民：以農業爲主的高山 Amharic 民族、以游牧和農業混合爲主的 Oromo 民族，以及依賴動物游牧爲生的 Afar 游牧民族。每一種民族皆有其獨特的經濟結構、語言、文化，以及與政治體制的關係。每一種民族受到旱災和饑荒的程度也不一樣；他們受到旱災的衝擊，以及復甦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非政府組織以相同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災難的受害者(因爲他們的居住地皆相毗鄰)，則這些救援實難以產生任何真正的發展意涵。²²

(三)變遷的持續性

能力和弱點分析，可以被應用在長時期的發展上，用以評估改變。在一個災難的前後，從事發展工作者可以識別出人民的弱點和能力，並據以評估民眾受到災難的衝擊程度。弱點和能力分析，也可以被使用來設計對一個援助項目的干

²¹ 林德昌編著，*人道主義憲章與賑災救助準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二〇〇二年），頁一七二。

²² Mary B. Anderson & Peter J. Woodrow, *Rising From The Ash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imes of Disast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17.

預，其後並可用來評估該項目對弱點和能力的影響。基本上，社會是動態的，沒有一件事是完全靜態的。因此，甚至在分析與評估報告完成後，改變依然持續進行著。將這種改變的事實牢記在心，可避免分析報告的過時與不適用。

(四)互動關係

如同隨著時間發展和改變的持續性，在分析上述的幾個因素之間，亦是不斷的產生互動。身體「弱點」的減少，可能伴隨著「能力」的增加；同時，也造成了從依賴的觀念，轉變到在動機領域上的有效性。一位重要的中央或地方政府領導者，可以激勵或帶領人民，動員組織力量，強化身體資源。因此，一個非政府組織若無法認知到這些互動關係的可能性，則可能會造成其計畫執行上的錯誤，進而影響到一個社區的真正發展。

(五)規模/層面

從小村莊到大城鎮，甚至到整個國家和區域，能力和弱點的分析架構，皆可以廣泛的被運用。當應用的規模擴大時，雖然所檢驗的因素變得難以精確界定，但從事發展工作者依然可以同時針對災難和發展的潛力來加以評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層面之間，亦經常產生互動關係，此足以影響到計畫的擬訂與執行。例如，在一個社會內部的小社區，其在單獨努力以減少其弱點，以及增加能力等方面，必然受到了相當外在制約。基本上，較小的政治單位，在區域、國家和國際的層面上，均易受到其上相關政策和政治事件的影響。此外，一個處於戰爭地帶的社區，雖然可能具有強大的內聚力，但仍然可能會受到周圍衝突的影響。

弱點與能力分析，本身並未提供任何答案。在任何特定的形勢與背景中，其並未指出所必須採行的辦法為何。基本上，此分析架構只是一個診斷的工具。但是，作為一種工具，其必然具有觀察與分析的力量；一種知識系統化的力量，也是對一種形勢的正確了解，使得從事發展工作者可以進一步辨識影響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可以更正確的預測，非政府組織在介入社區發展後，對其內部資源的可能影響。此可以避免非政府組織在計畫擬訂過程中，因錯誤的政策與執行方式，而付出昂貴的代價。

(一)決策點

當一個非政府組織在思考如何回應一個災難的發生時，必須要先釐清一些決策點。在每一個決策點中，一個非政府組織應該提出基本的發展問題：即介入該地區的發展，將會如何影響該地區的能力和弱點？在這些決策點上，能力/弱點分析實有助於一個非政府組織，評估其介入會產生發展效應的可能性；而且在每一決策點上，此一分析架構可提供對於如何作出抉擇的一種思考方式。

在整個決策過程中，以及在計畫擬訂的過程中，對地方參與人民的能力和弱點分析，也必須要同時完成評估。在進行弱點和能力的分析中，必須包含地方上人民的共同參與，以及資訊的蒐集和解釋。這是一種協助社區人民增加對本身形勢了解的最有效方式，藉以提升他們期望變革的能力。

(二)計畫項目的評估

能力和弱點分析，也提供了非政府組織評估其人道援助計畫的一種工具。在

每一個災難後的形勢中，人民所面對的立即需要都是可以辨識的。例如，在複雜的環境中，許多「需要評估」(needs assessment) 的有效方法，皆已眾所周知。然而，我們所要提出的問題，並非只是針對緊急的救援需要，而是要同時考慮到如何符合未來的發展需要。例如，在災民的饑荒中，最明顯的立即需要，乃是糧食和醫療救助。但是於此一形勢中，一些長期性的弱點，可能包括土壤惡化、水資源耗竭、破壞地貌和土地的使用、地區偏遠，以及醫療體系的不健全。但問題的癥結在於，一個非政府組織如何以一種修正長期弱點和建造能力(為長期發展)的方式與思維，來提供糧食和醫療援助？

茲舉例言之，在嚴重的災民饑荒中，除了饑餓外，經常亦會連帶引起腹瀉的疾病。當一個非政府組織決定參與饑荒的人道援助時，可能選擇下列三種方法：

1. 除了糧食的供應外，亦應派遣受過訓練的醫療團，前往難民營進行醫療；
2. 除了直接分配食物到村鎮外，亦招募中學畢業生，並施以醫療訓練，使在緊急災難之際，協助提供口服補充水份治療；
3. 訓練這些同一批的中學畢業生，作為公共衛生的教育者；前往不同的村鎮，對每一家的母親教導或說明，如何服用口服補充水份治療。這些作法會對社區的能力和弱點，產生長期性的影響。

由第一個方案中，可以在短期內拯救生命，消滅疾病。但對於其後的發展，則無所助益之處。第二個方案，提供服務給更廣大之人民；並在年輕人們團體中，注入了技術能力。第三個方案，在整個社區中，傳播了有用的技術和知識，永久性的影響了死亡率降低，並闡釋了以社區為基礎的有效公共衛生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不同的方案，也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弱點和能力分析。第一個方案，幾乎全然介入了身體和物質層面。第二個方案，不但影響了身體和物質層面，而且也開啓了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有利於社區的行動。第三個方案，更使災民和社區加強了一種「能力」的感覺，即家庭和社區可以有能力照顧他們自己。質言之，這就是一種從單純的人道災難，演變到同時含有發展能力的建構。對於積極從事國際人道援助的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而言，這正是一種最值得學習與採取的策略。

第五節 小結

根據本章的探討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弱點與能力兩項因素攸關人類的發展良窳。對於協助第三世界國家人類的發展工作者而言，如何了解特定環境下人類的弱點與能力，才能擬訂出正確的援助政策。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之，人類弱點的解決，仰賴的是立即的援助；易言之，此即是一種緊急的國際災難援助。但緊急的援助，雖然可解決燃眉之急，但卻無法培養未來發展的動力。因此，強化人類的發展動力，即是一種能力的建構。這種能力的建構，亦需要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協助。因此，對於人類發展所產生的貧窮與落後，不但是一種緊急救援的問題，而且也具有一種發展的意涵。如何結合短期的緊急救援

與長期的發展，正是解決人類發展問題的正確方向。簡言之，每一位人類皆有其弱點與優點，如何同時結合這兩點因素做整體性的考量與發展設計，亦是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民間非政府組織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於此，吾人所提的問題乃在於，國家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如何能透過人道援助的提供，除了達到立即的需要 (immediate needs) 外，如何能更進一步支持受援國的長遠發展目標？爲了要回答此一問題，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共同試圖經由對過去經驗的探討，尋找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俾有助於加強緊急援助所可能產生的發展意涵。例如，「國際救援發展計畫」(The International Relief/Development Project, IRDP)乃是由非政府組織所集體組成，其目標主要試圖探索在救援 (relief) 和發展(development) 之間的關聯性，並藉此獲取經驗教訓，做爲未來發展計畫的擬訂與執行。爲此，「國際救援發展計畫」針對了四十一個個案進行研究。²³其主要欲觀察的重點，在於當這些被研究的國家發生災難時，來自國外的機動性救援，是否亦具有長程發展的影響性？儘管在對這些個案的研究上，無論是在學術或組織層面上，均出現了相當大的分歧，但仍然產生了兩點共識。第一，在關於援助第三世界國家貧窮的人民方面，爲何援助都無法達到成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對此，非政府組織乃再次展開了重新的檢驗和探討。第二，爲了要提供有效的援助，援助國或援助機構必須要更了解受援者的現況和差異性。亦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受援國弱點和能力的分析，除了有助於提升非政府組織對災民的援助效率外，對台灣而言亦有相當的外交意涵存在。

根據本章的討論，台灣非政府組織或政府相關單位在進行國際人道援助時，必須要重新且全盤性的思考與擬訂策略。易言之，一個嶄新的台灣援外新架構，必須要跳脫傳統的雙邊經援政策，融合國際發展合作的精神與本質。本章的弱點與能力分析，除了可以提供我們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情勢外，並可使我們據以提出正確且適當的方式，來進行人道災難援助和國際發展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援助的方式從災難援助，轉變到同時對發展合作的重視，亦必然使我們與受援國的關係，由短期性轉變到中長期。就政治外交的觀點而言，這正是我們的建立與強化該受援國人民關係的最佳方式。

²³ 這三十個被研究的個案，包括了索馬利亞(四件)、衣索比亞(三件)、蘇丹(四件)、塞內加爾(三件)、馬利(七件)、哥倫比亞(四件)、秘魯(兩件)、厄瓜多爾、瓜地馬拉(二件)、墨西哥、Rajasthan State and Gujara State、印度、菲律賓(二件)、布吉納法索(四件)和泰國(兩件)。

第五章 統計數字：蒐集與分析的問題

第一節 前言

在推動與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過程中，依然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重大的障礙。這些國家的人民仍然處於貧困的狀態，多年來不僅沒有進步，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情況。這些國家的發展困境，急需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切與援助。自一九九〇年以來，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不但減緩了內部農村的貧窮問題，同時也為亞太地區的絕對貧困減少了一半。對阿拉伯國家、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國家而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進程，有助於其在二〇一五年達到「千年發展目標」。但是，對其他地區而言，「千年發展目標」依然是遙不可及。

就當前的觀察與研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恐怕要等到二一廿九年，才能實現初等教育普及的目標；直到二一六五年，才能將兒童死亡率減少三分之二。由於這些國家的發展呈現持續惡化，因此消滅貧窮的目標依然遙遙無期。同時，南亞國家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上，亦同樣面臨相當大的障礙因素。

在一九九〇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最重要的發展領域上，出現了嚴重的倒退現象。例如，約有五十四個國家比其在一九九〇年更為貧困；有廿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正在忍受饑餓之苦；有十四個國家五歲以下的兒童，呈現死亡率增加的情勢。在小學入學率方面，卻有十二個國家出現下降的局面。總之，在一九八〇年代，只有四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出現了倒退。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人類發展指數倒退的國家增加到廿一國之多。造成倒退的原因，主要在於經濟增長的失敗，以及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擴散。在一九九〇年代，一些西方發展國家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也出現了銳減的情況，此乃導致貧窮國家的外債問題更形惡化。

因此，我們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時，絕對不能只觀察該國的平均數。許多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同時擴大了貧富差距；如果我們將注意力全集中在發展好的地區或特定社會團體，則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在字面上，其目標可能早已實現。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國家在統計數字上，雖然達到了國際社會所預期的目標，但同時卻有更多的民眾，變得更為弱勢和更為貧困。例如，在中國大陸、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國的總體發展另人激賞，但同時卻有更多的社會大眾陷於更為貧窮的狀態中。因此，在許多面臨貧困的國家中，這些發展的負擔皆需為社會中的邊緣和弱勢民眾所共同承擔。對這些貧困人士而言，一個國家平均的經濟發展數字，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從統計數字的層面來看，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自公元兩千年推動以來，已然出現了下列的盲點：(一)區域之間的內部發展，出現了重大的差異；(二)在一九九〇年代，人類的發展出現了倒退；(三)為實現發展目標所付出的努力，出現了倒退、停滯；(四)一些最貧困的國家，在

發展方面表現的不錯；(五)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是誰的發展遭到了漠視與忽略？爲了有效回答這些問題，本章擬從統計資料與數據的問題，以及分析方法和指標衡量等角度，探討其對人類發展所產生的錯誤認知與研究。

第二節 統計數據的問題

根據「千年發展目標」，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若要擬訂良好的政策，則必須要依賴可靠、正確與及時的統計數字。同時，決策者必須要依賴這些統計數字，以監控發展的速度，並據此評估發展的結果。雖然最近幾年來有關發展的統計數據，已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對於如何蒐集有關人類的基本發展數據，則依然是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大障礙。

「千年發展目標」所揭櫫的各項發展指標，雖然有助於衡量各國的發展進程，但這些統計數字基本上是依據各國所提供的數據，而進行整理與估計。由於每一個國家的發展背景有所差異，因此對於每一項指標不僅存在著重大的差距，而且統計數字的相關性、精確性、一致性，以及可靠性，皆令人質疑。例如，雖然衡量「千年發展目標」指標的許多數據，可以從不同的國家獲得，但這些資料卻不見得是最合適的。每天生活費用一美元的指標，則是衡量絕對貧困的指標中，最具爭議性的一項。另一個例子，在於持續地獲得可負擔的必需藥物指標，其中的獲得和可負擔，即難以獲致精確且一致的衡量。

統計數字的另一項缺點，在於許多國家缺乏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一年，關於收入貧困、身體健康、性別不平等、就業，以及環境等指標；同時，也有許多國家欠缺此一時期發展趨勢的數據。根據表 2，在缺乏任何數據的國家方面，主要資料的缺乏是表現在十五歲到廿四歲孕婦感染愛滋病的比率、生活水平每日未達一美元的人口，以及讀到五年級的學童等。在缺乏趨勢數據的國家中，年齡體重不足的兒童、醫護人員的協助分娩，以及生活水平每日不足一美元的人口等方面，在各國都是完全的付諸闕如。此表顯示了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統計數據的嚴重性。

表 2：缺乏發展統計數據的發展中國家和中東歐國家，1990-2001 (%)

指標	沒有趨勢數據的國家	缺乏任何數據的國家
相對於年齡體重不足的兒童	100	22
小學入學率	46	17
讀到五年級的學童	96	46
熟練醫護人員護理下的分娩	100	19
非農業工資雇員中女性	51	41

比例		
主要城市地區中十五歲到廿四歲孕婦感染愛滋病的比率	100	91
可以永續獲得改善水源的人口	62	18
生活水平每日不足一美元的人口	100	55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atabase on Contraceptive Use. March 2003.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另外一些統計數據的問題，則係出現在孕婦和產婦的死亡率，以及愛滋病和愛滋病毒的傳染範圍上。這些統計數字的錯誤與不正確，主要源自於人口登記的不完整，或是調查的方式不具代表性。但是這些數據也可能因為不同時期的調查，以及定義、蒐集方法，以及調查範圍的差異與變化，而無法形成任何可資比較的基礎。

由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無法理解到利用統計數字，作為發展決策依據的重要意義，因此這些國家面臨了統計數據的缺乏與不重視。例如，在過去十餘年來，這些國家並未進行過人口普查，且亦未採用最新的統計標準與方法，故造成數據的分析與解釋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改善國家的統計制度，則除了要強化對統計數據的重視外，但要增加相關資金與資源的投入。此外，透過教育和宣傳，以提升政府政府和社會民眾的使用統計數字的能力，也是加強國家統計制度的重要環節。然而，除了國家層面的努力外，國際社會亦須同時要加強宣傳統計數據和制度，對於支持有效治理和賦權人民的重要性，並對統計制度進行長期並對統計制度進行長期的投資。此外，國際社會亦應該重視與加強在統計分析人員、統計制度的管理人員、以及統計數據的使用者等方面的人才培訓；並設計統計數字的蒐集工具與方法，以增加數據的可獲得性與正確性。

許多國際組織為了要縮小在貧困、健康和教育等問題上的差距，已經在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各種的家庭調查。這些調查針對了貧困人口的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如人口統計、健康調查、多指標調查、生活水平測量，以及核心福利指標問卷等，提供了相關的重要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調查活動不但有可能扭曲當地的優先發展順序，對於改善當地的統計制度與基礎設施，亦無實際之助益可言。為了要解決上述之缺失，推動永續的統計制度發展，減少對統計數據的扭曲與錯誤，則應該在國家整體統計的架構下，進行數據的蒐集與分析。例如，烏干達設立了統計機構，強化了統計制度的管理。馬拉威在國際社會的援助之下，亦加強了對家庭調查數據的分析，提高了對貧困的認識與了解。

在國家統計制度方面，「千年發展目標」亦指出要重視與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相關制度發展，建立經常性的收入和消費調查，尤其是對極端貧困和其他基本生活條件的數據進行評估與蒐集。此外，國際社會亦應協助這些發展中國家，加強衛生保健、人口，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統計計畫與資料。儘管目前許多調查計畫，亦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但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極端貧困和基本生活條件，卻未能提供持續且可靠的數據，亦未採用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法。有鑑於此，國際貧困調查乃提供了一個國際的標準架構，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調查計畫，俾蒐集國家和國際社會層面的有效數據。許多貧困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受到資源的嚴重限制，因此除了最基本的統計設備和培訓外，其他均深感匱乏。為此，國際社會需要提供大量必要的資金，以強化發展中國家的永續統計制度與能力。世界銀行所建立的「統計能力建設信託基金」，其主要目的即是在於撥款協助發展貧困國家的宏觀計畫，以及統計能力建設等。

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內部，亦面對著鬆散的統計制度。易言之，統計計畫經常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並不受到國家統計局的指揮。此乃造成了相關國家在統計數據的蒐集方面，出現了不一致的現象，使得資料的正確性遭到質疑。為了要改善此一問題，聯合國及其地區性委員會的統計辦公室，亦不斷加強與各國統計機構的合作。例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其統計部門亦經常與各國的統計機構進行合作。一九九九年，聯合國所建立的「統計為了廿一世紀的發展夥伴關係」，即試圖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將國家和國際的統計學家和統計數據的使用者加以結合，以強化統計能力建設，並提高貧富國家之間的協調合作。

第三節 測量收入貧困的問題

「千年發展目標」所主張在二〇一五年達到貧困減半的目標，一直引起相當大的爭論。爭論的起因，主要源自於缺乏明確衡量貧困的方法。因此，為了要能正確的衡量貧困，則首先要界定何謂貧困？其次則要採用適當的方法論來進行探討與分析。

絕對貧困乃是衡量「千年發展目標」實現程度的重要指標。此一指標的操作，則是日常生活水平低於一定收入的人口比例。此一收入，即是所謂的貧困線，也是最引起爭議的論點。以國家貧困線為基礎的貧困率，雖然能夠表現出一個國家在不同時間範圍內的貧困狀況，但此一貧困線所依據的，卻是一個國家的個人體面生活所需的收入。例如，由於各國使用以評估貧困線的消費成本，以及各國的貧困線的界定和方法，皆有所差異，因此俄羅斯聯邦的最低生活品質標準，與海地必然亦有所不同。各國所制定的貧困線，由於在概念的定義和衡量標準均有不同，因此難以在國與國之間進行比較。

若欲對各國的貧困線進行比較研究，則至少要在理論上使用依據國際貧困線

而確定的貧困數據。為實現此一目標，世界銀行使用的乃是將每天生活費大約一美元，訂為極度貧困線。此乃根據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而設立的。此一貧困線所依據的假設，主要係對各國生活費用差別進行調整後，每日一美元是在發展中國家維持基本生活(subsistence)的平均最低消費。然此一方法，由於無法正確的將發展中國家的最低生活水平呈現出來，因此其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使用上，一直受到普遍的批評。

有些學者認為貧困，是一個由社會所界定的概念，此意指一個人的貧困，乃是相對於其他的同胞而言。因此，這種貧困的概念，乃是一種相對的名詞。²⁴依照此一概念，隨著收入的提高，貧困線亦必然隨之增加；此無形中駁斥了國家間具有共同貧困線的說法。瑞迪(Sanjay Reddy)教授針對每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並建議根據當地所界定的最低能力，來確立真正的貧困線何在。²⁵再者，雷瓦力恩(Martin Ravallion)教授亦認為每日一美元的貧困線簡便易行，故支持此一貧困標準。基本上，此一貧困標準的主要優點，因其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貧困人民被剝奪的悲慘程度，故實具有相當的宣傳效力。²⁶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國際貧困線在概念定義和方法論上，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性，此使得計算出來的貧困數據，經常發生錯誤的估算，進而令人存疑其有效性。

每日一美元的貧困線，所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亦源自於國際價格差異而所進行的調整。假設每日一美元的貧困線，乃是發展中國家溫飽消費品的基本平均價格，則這些消費品的價格仍須轉換成本國的幣值。世界銀行轉化這些價格時，採用的是購買力平價(PPP)的比率，即使用一個國家一組商品的價格，與另外一個國家的同類商品價格，在進行比較後所得出的價格指數。然而由於獲得這些價格指數的過程，並不完全透明；再者，這些商品所依據的價格，亦非貧困人民消費商品的價格，此乃造成所計算出的貧困線數據並不正確。更有甚者，上述價格的轉化，亦未考慮到這些國家中的巨大貧富差距，以及貧富之間的重大價差。

世界銀行每日一美元的貧困線，主要係根據收入和預算調查與統計而出的，後者所提供的是分配和收入、消費水平的訊息。在某些國家的貧困線下，此二指標決定了收入貧困率。但是否應該採用另一種消費集合，來代替此類調查所得出的收入水平，一直存在著重大的爭議。有些學者認為，由於多種原因的存在，這些調查基本上低估了貧困國家中特別富裕人口的收入。²⁷為了要避免此一問題的產生，亦有許多國家根據國民核算中平均消費的數據，來計算貧困率。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各國國民核算的方法較具一致性，但根據調查所得出的收入水平，並不一定會比前者更為正確。關於消費的國民核算數據，由於包含了金融服務、

²⁴ Sharon Oster, Elizabeth Lake and Conchita Oksma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²⁵ Sanjay Reddy and Thomas Pogge,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ew York, March 2003. <http://www.columbia.edu/~sr793/count.pdf>.

²⁶ Martin Ravallion, "Should Poverty Measures Be Anchored to the National Accou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4, no 35./36 (2000): 3245-3252.

²⁷ Miguel Szekely and Marianne Hilgert, "What's Behind the Inequality We Measure?" An Investigation Using Latin American Data." Working Paper 409.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1999.

從雇主支付的養老基金中，估算出的租金和收入等物品，不比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可能更為完整。但這些物品並非窮人所消費的，因此儘管收入調查低估了平均收入，但並不意味高估了貧困。進一步而言，隨著國家的富裕與成長，對這些物品所缺乏的調查，必然誇大了貧困人民消費的增長。

根據上述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使用國民核算方法，而不採用收入調查來了解窮人的收入水平，亦存在著高估貧困線下降的風險。易言之，使用國民核算方法，會低估除最貧困國家外所有國家的貧困人口數量；但對於最貧窮的國家，由於使用國民核算方法，排除了大量非正式的活動，乃使得貧困率遭到誇大。使用調查所獲得的收入水平，因其直接對與貧困家庭有關的收入和消費品進行分析，因此避免了上述問題的產生。

最後，調查本身在測量和解釋等方面，亦遭遇到了嚴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這些調查方式，在最需要調查的國家卻不夠普遍。此乃因為調查成本過高，而且需要相當的技術來進行設計和執行。此外，由於定義、方法、含蓋範圍，以及正確性等，因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間，經常導致相當大的差異性。因此，使用收入調查所獲得的貧困率，對各國貧困水平所作出的結論，可能具有誤導的作用。有鑑於此，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應針對在購買力平價的基礎上，推動相關價格的蒐集工作，使其能真正的反映出貧困人民的最低生活水準。

第四節 最優先國家和高度優先國家的界定

根據二〇〇三年所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確定了各項「千年發展目標」上的所謂最優先國家和高度優先國家。此主要係依據這些國家在每一項發展目標的人類貧困程度，以及一九九〇年代的發展趨勢。評估一個國家實現各項「千年發展目標」的狀況，主要依賴該國在該發展目標上的進展情況，如緩慢、倒退或快速成長，以及該國在該發展目標上的人類貧困程度。倘一個國家在該發展目標上，是屬於進度緩慢或甚是倒退，則該國就被訂為該發展目標的最優先國家。此外，倘一個國家處於極端人類貧困，且實現該目標的速度中等；抑或該國家屬於中等人類貧困，但實現該發展目標的進度緩慢或倒退，則這些國家就會被列為次優先的國家。

至於評估一個國家在實現所有發展目標上的優先程度，則根諸於該國處於最優先或次優先地位的目標數量。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具有下列特性，則該國即可被訂為所有目標上的最優先國家：(一)至少在三個目標上處於最優先的地位；(二)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目標上，處於最優先地位，並且其中至少有三個可用數據點；(三)只有兩個目標具有可用數據，但皆處於最優先的地位。此外，倘一個國家不屬於最優先國家的範疇，且具有如下之特性時，則可訂為所有目標上的高度優先國家：(一)至少在三個目標上，處於最優先或次優先地位；(二)在兩個目標上處於最優先地位；(三)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目標上，處於最優先或高度優先的地位，並且其中至少有三個可用數據點；(四)只有兩個目標具有可用數據，並且

處於最優先或次優先地位。

此外，在界定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上，基本上可區分為緩慢或倒退、中速或快速。倘按當前發展趨勢持續到二〇一五年，實現該目標的實際進展程度，僅達到理想進展程度的一半以上時，則可界定為緩慢或倒退。倘按當前發展趨勢持續到二〇一五年，實現該目標的實際進展程度，達到理想進展程度的一半以上，但卻未答到理想的進展程度，則此界定為中速進展；最後，倘按當前發展趨勢持續到二〇一五年，實現該目標的實際進展程度，達到或超出理想進展程度時，則稱之為快速的進展。

在總體「千年發展目標」上，被列為最優先國家的共有卅一個，被列為高度優先國家的則有廿八個之多。根據表 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屬於最優先國家的共有廿五國，屬於次優先國家的則亦有十三國。此顯示該地區的發展與人類貧困，實已面臨了最為嚴重的問題。此外，在屬於最優先的國家中，亦有三個來自阿拉伯國家，一個分別來自南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以及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家。在次優先國家中，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以外，東亞和太平洋，以及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家，亦分別有四個國家；此外，在阿拉伯國家和拉丁美洲，亦分別有三個國家屬於此一範圍。

表 3：最優先和高度優先國家的地理分佈，2002

	最優先國家	高度優先國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13
東亞和太平洋	0	4
南亞	1	1
阿拉伯國家	3	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	1	3
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家	1	4
總計	31	28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Washington D.C.: UNDP, 2004), 43.

雖然我們無法使用單一的因素，來解釋這些國家的貧困現象，但基本上亦有一些共同性可以提供說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中，有許多國家地處內陸，且有大量的人口遠離海岸線。此外，大部份的這些國家規模皆很小，僅有四個國家的人口超過了四千萬。這些人口長期以來與國際市場隔離，所以很難將初級產品轉換成附加價值高的商品。事實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十七個國家中，有十四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額的四分之三強。此外，愛滋病的肆虐，以及內戰與衝突的頻仍，亦造成了這些非洲國家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中。

在實證研究方面，根據表可以看出，在發展目標上面臨最大的問題，乃在於收入貧困、饑餓，以及兒童死亡率等方面，屬於這些範圍的最優先國家，分別有卅三個、廿個和卅二個之多。此外，在次優先國家中，面臨最大的發展議題，乃是在收入貧困、饑餓、兒童死亡率，以及享受衛生設施等方面。整體而言，收入貧困、饑餓和兒童死亡率的問題，皆是發展中國家所遭遇到的最大發展困境。

表 4：最優先國家與高度優先國家數目，按發展目標區分 2002

	最優先國家	高度優先國家
收入貧困	33	19
饑餓	20	18
初等教育	10	12
性別平等	10	5
兒童死亡率	32	24
獲得飲用水	8	10
享受衛生設施	14	17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4).

第五節 小結

造成人類發展問題的難以解決，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在於資料的難以蒐集，以及資料和數據的缺乏可靠性。發展中國家由於教育的落後，以及技術的缺乏，造成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面臨重大的障礙。這些資料和數據的缺乏，使得國際社會無法真正掌握落後國家的發展情勢。此外，在指標的設計與衡量上，由於國情的不同，也必然造成這些指標的不適用性。再者，許多發展中國家對研究調查知識的匱乏，更造成了研究結果的喪失其客觀性。例如，每日一美元收入的貧困線，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而言，仍然是無意義的，因為一美元仍然無法購買到其所欲獲得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從購買力和消費能力的觀點，來探討人民的貧困問題，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是不適用的。

本章根據不同國家的發展背景，從發展的需要性來看，共有卅一個國家被列為最優先需要援助的國家，而有廿八個國家被列為高度優先需要被協助者。就地理的分佈模式與集中趨勢而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屬於最優先的國家，則共有廿五國之多，屬於次優先的國家，則亦有十三國。此顯示出該地區的發展與人類貧困，實已成為國際社會必須加強注意的所在。此外，在屬於高度優先的國家中，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外，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協，亦分別有四個國家屬於此一範疇。這些國家需要被援助的列出優先等級，實有助於國際社會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發展最急迫的國家之上。

第六章 人類發展指數

第一節 前言

人類發展指數乃是針對人類發展概念的三項內容，如健康長壽的生活、接受教育，以及體面的生活水準等，所做的簡便且概括性的衡量。由於人類發展指數亦將人類預期壽命、入學率、識字率和收入水平等幾個指標結合在一起分析，因此比單獨使用收入水準指標，但能觀察與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情況。自一九九〇年人類發展指數建立以來，同時也發展了三種補充性指數，藉以分析與闡釋人類發展的特殊性。這三個補充性指數，分別是人類貧困指數(HPI)、性別發展指數(GDI)，以及性別賦權尺度(GEM)。

人類發展指數能顯示出，某些國家取得了相當的發展，而其他國家則進展緩慢或倒退。例如，在一九七五年，委內瑞拉的人類發展指數比巴西為高，但巴西後來的發展卻更快。同年，芬蘭的人類發展指數比瑞士為低，但目前則稍比瑞士領先。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人類發展指數和人均國家生產所得，所進行的國家排名結果也有所差異。此一差異說明了沒有高收入，亦能實現高水平的人類發展；而且高收入亦無法保證人類發展的高水平。巴基斯坦和越南兩國雖然收入相當，但是越南在把收入轉化為人類發展上，則成就顯然是更大。瑞士的收入雖然僅有博茲瓦納的三分之二，但兩者的人類發展指數係屬相同。因此，只要能推動合理的政策，各國即能在低收入的條件下，提高人類的發展水準。

在過去十四年來，大部份地區的人類發展指數皆處於穩定提升的情況。在一九九〇年代，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發展表現極為優秀。同時，阿拉伯國家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在相比較之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則一直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一九八五年，該地區的發展水平與南亞地區不分軒輊，但現在卻遠遠落在南亞之後。就全球層面而言，有兩種類型的國家，其人類發展指數則呈現了下降的趨勢。例如，處於經濟轉型階段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遭受愛滋病和國內衝突而導致貧困的非洲國家等皆是。

儘管人類發展指數是一種有用的發展指標，但其卻忽視了人類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部份，即參與影響人類生活的決策能力。事實上，人類可以表現出富裕、健康和良好的教育程度，但若無參與能力，則人類發展即無法獲得突破。自第一本「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出版以來，人類發展指數忽略自由要素的缺點即告呈現。因此，乃推動了一九九一年人類自由指數(HFI)，以及一九九二年政治自由指數(PFI)的制訂。但沒有一個指數在一年後依然繼續獲得使用。此說明了欲使用一套指數充份反映如此複雜的人類發展內容，依然是相當的困難。然此並非意指著，在考慮一個國家的人類整體發展狀況時，可以完全忽略政治和自由的指數。

人類發展指數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人類發展指數中的三項發展內容，與千年發展目標中的前七項目標非常類似，因為兩者皆重視

教育、健康和生活水準等問題。進一步而言，性別發展指數和性別賦權指數的目標，分別是要反映人類能力和政治經濟決策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此與千年發展目標中的關注提高性別平等和賦權於婦女的第三項目標，極為類似。因此，根據聯合國發展計畫署的定義，凡是人類發展指數在零點八以上者，即屬於高度人類發展的國家；人類發展指數在零點五到零點七九九之間者，屬於中度人類發展國家；而人類發展指數低於零點五者，即屬於所謂的低度人類發展國家。

第二節 人類發展指數：概念的操作化與計算過程

人類發展指數是對人類發展成就的總體衡量。其主要是要測量一個國家在人類發展的三個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一)健康長壽的生活，使用出生時預期壽命來表示。

(二)在知識方面，使用成人識字率(佔三分之二的權重)，以及小學、中學和大學的綜合淨入學率(佔三分之一的權重)來表示。

(三)體面的生活水準，以人均 GDP 來表示。

在計算人類發展指數之前，需要先計算出以上三種方面分別對應的指數。然而為了計算此預期壽命、教育和 GDP 等三項指數，則需要選定每個基本指標的最小和最大值。首先，透過下面的公式，將每項的成就表示成 0 到 1 的數值。

$$\text{分項指數} = \frac{\text{實際值} - \text{最小值}}{\text{最大值} - \text{最小值}}$$

人類發展指數則是此三個內容指數的簡單平均值。

茲以阿爾巴尼亞為例，來進行人類發展指數的計算過程。

計算阿爾巴尼亞人類發展指數的值：

指標	最大值	最小值
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85	25
成人識字率(%)	100	0
綜合淨入學率(%)	100	0
人均 GDP(美元)	40,000	100

人類發展指數的計算過程：

(一)計算預期壽命指數

預期壽命指數衡量的是一個國家人口出生時，預期壽命方面的相對成就。在二〇〇一年，阿爾巴尼亞人口的預期壽命為七十三點四歲，則預期壽命指數為 0.807。

$$\text{預期壽命指數} = \frac{73.4 - 25}{85 - 25} = 0.807$$

(二)計算教育指數

教育指數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在成人識字率，以及小學、中學和大學綜合淨入學率兩方面的相對成就。首先，計算成人識字指數和綜合入學指數，然後將此兩項指數合併計算出教育指數，其中成人識字率指數的權重為三分之二，綜合淨入學指數的權重為三分之一。阿爾巴尼亞二〇〇一年的成人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點三，而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學年的綜合淨入學率為百分之六十九，則教育指數為 0.798。

$$\text{成人識字率指數} = \frac{85.3 - 0}{100 - 0} = 0.853$$

$$\text{綜合入學指數} = \frac{69 - 0}{100 - 0} = 0.90$$

$$\begin{aligned} \text{教育指數} &= 2/3 (\text{成人識字率}) + 1/3 (\text{綜合入學指數}) \\ &= 2/3 (0.853) + 1/3 (0.690) \\ &= 0.798 \end{aligned}$$

(三)計算 GDP 指數

GDP 指數是用調整後的人均 GDP(美元)來計算的。在人類發展指數中，收入代表的是未被健康長壽的生活，以及知識反映的人類發展的一切方面。因為實現體面的人類發展水平，並不需要無限多的收入，所以對收入進行了調整。在計算 GDP 指數時，使用的是收入取對數後的數值。阿爾巴尼亞在二〇〇一年的人均 GDP 為三千六百八十美元，則 GDP 指數為 0.602。

$$\text{GDP 指數} = \frac{\text{Log}(3680) - \text{log}(100)}{\text{Log}(40000) - \text{log}(100)} = 0.602$$

(四)計算人類發展指數

一旦各分項指數被計算出來後，人類發展指數乃是將此三項指數的簡單平均值。所以，人類發展指數 = 1/3 (預期壽命指數) + 1/3 (教育指數) + 1/3 (GDP 指數) = 1/3 (0.807) + 1/3 (0.798) + 1/3 (0.602) = 0.735

第三節 人類貧困指數

(一)發展中國家的人類貧困指數(HPI-1)

人類發展指數，反映的是人類發展平均成就，而 HPI-1 關注的是 HDI 所反映的人類發展中的三個基本方面的被剝奪情況：

1)健康長壽的生活：在相對低齡時易死亡，用出生後不能活到四十歲的概率來表示。

2)知識：被排除在閱讀和交流的世界之外，用成人文盲率來表示。

3)體面的生活水平：不能全面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利益，用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百分比和五歲以下的兒童體重不足的百分比來表示。

HPI-1 的計算比人類發展指數的計算更簡單。由於用來計算被剝奪情況的指標已經標準化在 0 到 100 之間（因為被表示成百分比），所以不用像計算 HDI 那樣先生成分項指數。

計算體面生活水平的被剝奪情況，原本也應包括獲得衛生服務的指標。但是因為近年來無法獲得可靠的衛生服務方面的數據，所以今年的報告中測量體面生活水平的被剝奪情況是用如下兩個而不是三個指標來表示的：無法持續獲得改善後水源的人口百分比和五歲以下體重不足兒童的百分比。

HPI-1 的計算：

體面生活水平被剝奪情況的計算

體面生活水平被剝奪情況是用兩個指標的不加權平均數來計算的：

$$\begin{aligned} \text{不加權平均} &= 1/2 \text{（不能持續獲得改善後水源的人口）} \\ &+ 1/2 \text{（五歲以下體重不足兒童）} \end{aligned}$$

例：中非共和國

不能持續獲得改善後水源的人口=30%

五歲以下體重不足兒童=23%

不加權平均數=1/2（30）+1/2（23）=26.5%

計算 HPI-1

HPI-1 的計算公式如下：

$$HPI-1 = [1/3 (\rho_1 + \rho_2 + \rho_3)]^{1/3}$$

其中：

$$\rho_1 = 55.3\%$$

$$\rho_2 = 51.8\%$$

$$\rho_3 = 26.5\%$$

$$HPI-1 = [1/3 (55.3^3 + 51.8^3 + 26.5^3)]^{1/3} = 47.8$$

(二)部份 OECD 國家的人類貧困指數(HPI-2)

HPI-2 不僅像 HPI-1 一樣關注三個方面的被剝奪情況，同時還關注社會排斥性指標。因此 HPI-2 體現了反映了四個方面的被剝奪情況：

1)健康長壽的生活---在相對低齡時易死亡，用出生後不能活到 60 歲的概率

來表示。

2)知識---被排除在閱讀和交流的世界之外，用功能性識字障礙的成人（16-65歲）所佔百分比來表示。

3)體面的生活水平---用生活在收入貧困線以下（中等可支配家庭收入的50%）的人口所佔百分比來表示。

4)社會排斥---用長期（12個月或更長）失業率來表示。

HPI-2 的計算

HPI-2 的計算公式如下：

$$HPI-2 = [1/4 (\rho_1^a + \rho_2^a + \rho_3^a + \rho_4^a)]^{1/a}$$

其中：

ρ_1 =出生後不能活到 60 歲的概率（乘以 100）

ρ_2 =功能性識字障礙的成人百分比

ρ_3 =在收入貧困線以下（中等可支配家庭收入的 50%）的人口百分比

ρ_4 =勞動力長期失業率（12 個月或更長時間）

$a=3$

例：英國

$\rho_1=8.9\%$

$\rho_2=21.8\%$

$\rho_3=12.5\%$

$\rho_4=1.3\%$

$$HPI-2 = [1/4 (8.9^3 + 21.8^3 + 12.5^3 + 1.3^3)]^{1/3} = 14.8$$

在計算 HPI-1 和 HPI-2 時，為什麼 $a=3$

a 的取值對計算 HPI 的值有很大影響。如果 $a=1$ ，則 HPI 為其分項指數的平均值。當 a 增大時，被剝奪情況最嚴重的分項指數的權重就加大。因此，當 a 增加趨於無窮時，HPI 的值將趨於被剝奪情況最嚴重的分項指數（如在計算 HPI-1 時所舉的中非共和國的例子，該數值將為 55.3%，等於出生後不能活到 40 歲的概率）。

本報告中，數值 3 被用來給予被剝奪情況較嚴重的領域額外權重擔，不是決定性的權重。HPI 數學公式的詳盡分析可參見 Sudhir Anand 和阿馬蒂亞·森著的「有關人類發展和貧困的概念：多維視角」以及「1997 年人類發展報告」的技術注釋部份（參見本技術注釋末尾所列的部份參考讀物）。

第四節 性別發展指數

人類發展指數，反映的是人類發展的平均成就；而性別發展指數則是對平均成就進行調整，以反映在如下方面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

1)健康長壽的生活,用出生時間預期壽命來表示；

2)知識,用成人識字率以及小學.中學和大學綜合毛人學率來表示；

3)體面的生活水平,用所得收入的估計值(PPP 美元)來表示。

性別發展指數的計算分三步驟進行之；首先，根據下面的一般公式，來計算女性和男性在每一方面的指數：

$$\text{分項指數} = \frac{\text{實際值} - \text{最小值}}{\text{最大值} - \text{最小值}}$$

其次，每一分項的女性和男性指數，要透過體現男女之間成就差距的方式綜合在一起，得到的就是平均分布指數。其一般計算公式如下：

$$\text{平均分布指數} = \{[\text{女性人口比例}(\text{女性指數}^{1-\epsilon})] + [\text{男性人口比例}(\text{男性指數}^{1-\epsilon})]\}^{1/1-\epsilon}$$

ϵ 衡量的是對不平等的厭惡程度；在性別發展指數的計算過程中， $\epsilon = 2$ ；如此一來一般公式就變為：

$$\text{平均分布指數} = \{[\text{女性人口比例}(\text{女性指數}^{-1})] + [\text{男性人口比例}(\text{男性指數}^{-1})]\}^{-1}$$

此一計算過程，提供了女性和男性指數的調和平均值。

第三步步驟，將三個平均分布指數，透過不加權平均，綜合得到性別發展指數的值。

計算性別發展指數時的值：

指標	最大值	最小值
女性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87.5	27.5
男性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82.5	22.5
成人識字率(%)	100	0
綜合淨人學率(%)	100	0
收入估計值(PPP 美元)	40000	100

注：考慮到女性的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女性預期壽命最大和最小值(值)多加了五年。

性別發展指數的計算

下面使用泰國的數據來顯示性別發展指數值的計算

1)計算平均分布預期壽命數據

首先，運用分項指數的一般計算公式，分別計算女性和男性預期壽命成就指數。

女性	男性
預期壽命:73 .2 歲	預期壽命:64 .9 歲
預期壽命指數 = $73.2-27.5 / 87.5-27.5$	預期壽命指數= $64.9-22.5/82.5-22.5$
=0.762	=0.707
平均分布預期壽命指數= $\{[0.508(0.762)^{-1}]+[0.492(0.707^{-1})]\}^{-1}=0.734$	

2)計算平均分布教育指數

首先，分別計算女性和男性的成人識字率，以及小學、中學和大學綜合淨人學率，因為這些指標已被標準化在 0 到 100 之間，所以這兩個指數的計算相當的直接明確。

女性	男性
成人識字率：94 .1%	成人識字率：97.3%
成人識字指數：0.941	成人識字指數：0.973
淨人學率：69 .3%	淨人學率：74.6%
淨人學指數：0.693	淨人學指數：0.746

其次，成人識字指數占三分之二的權重，以及總人學指數占三分之一的權重，分別計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指數。

$$\begin{aligned}\text{教育指數}&=2/3(\text{成人識字率})+1/3(\text{淨人學指數}) \\ \text{女性教育指數}&=2/3(0.94)+1/3(0.693)=0.858 \\ \text{男性教育指數}&=2/3(0.973)+1/3(0.746)=0.897\end{aligned}$$

最後，女性和男性教育指數，合併計算平均分布教育指數：

女性	男性
人口比例：0.508	人口比例：0.492
教育指數：0.858	教育指數：0.897
平均分布教育指數= $\{[0.508(0.858^{-1})]+[0.492(0.897^{-1})]\}^{-1}$	
=0.877	

3)計算平均分布收入指數

首先，估計女性和男性的所得收入(PPP 美元)；然後，計算每個性別的收入指數，再計算人類發展指數時，對估計所得收入(PPP 美元)取對數，來對收入進行調整：

$$\text{收入指數} = \frac{\log(\text{實際值}) - \log(\text{最小值})}{\log(\text{最大值}) - \log(\text{最小值})}$$

女性	男性
估計所得收入(PPP 美元)：4875 美元	估計所得收入(PPP 美元)：7975 美元
收入指數	收入指數
$\log(4875) - \log(100) = 0.649$	$\log(7975) - \log(100) = 0.731$
$\log(40000) - \log(100)$	$\log(40000) - \log(100)$

其次，將女性和男性收入指數合併，計算平均分布收入指數

女性	男性
人口比例：0.508	人口比例：0.492
收入比例：0.649	收入比例：0.731
平均分布收入指數 = $\{[0.508(0.649^{-1})] + [0.492(0.731^{-1})]\}^{-1} = 0.687$	

4) 計算性別發展指數

性別發展指數的計算簡單明瞭，其只是三個分項指數(平均分布預期壽命指數、平均分布教育指數，以及平均分布收入指數)的不加權平均。

$$\begin{aligned} \text{GDI} &= 1/3(\text{預期壽命指數}) + 1/3(\text{教育指數}) + 1/3(\text{收入指數}) \\ &= 1/3(0.734) + 1/3(0.877) + 1/3(0.687) \\ &= 0.766 \end{aligned}$$

計算性別發展指數時，為什麼 $\varepsilon = 2$ ？基本上， ε 的值表示對性別不平等的懲罰程度，該值愈大，具有不平等的社會受到的懲罰愈重。

如果 $\varepsilon = 0$ ，性別歧視未被懲罰(在這種情形下，性別發展指數的值與人類發展指數的值相同)。當 ε 趨向於無窮大時，愈來愈大的權重，給予了成就較少的組別。若在計算性別發展指數時，使用了數值 2(計算 GEM 也是如此)，這個值給發展成就中的性別歧視，施加了適當的懲罰。

第五節 性別賦權標準

性別賦權標準(GEM)，著重於婦女的機會而不是能力。性別賦權標準關注三個關鍵領域的性別歧視：

(一) 政治參與與決策權利，用女性和男性間議會席位的百分比來表示。

(二) 經濟參與和決策權利，用兩個指標來表示：女性和男性的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的百分比、以及女性和男性在專業和技術崗位的百分比比例。

(三)對經濟資源的支配權，用女性和男性所得收入(PPP 美元)來表示。

此三個方面，各自平均分佈的百分比當量(EDEP)，是以人口比例為權重進行的加權平均。其計算公式如下：

$$EDEP = \frac{1}{1-\varepsilon} \{ [\text{女性人口比例} (\text{女性指數}^{1-\varepsilon})] + [\text{男性人口比例} (\text{男性指數}^{1-\varepsilon})] \}$$

ε 衡量的是對不平等的厭惡程度。在 GEM 的計算中(如同計算 GDI 一樣)， $\varepsilon = 2$ ，對性別歧視施加了合適的懲罰。這樣，一般公式就變為：

$$EDEP = \{ [\text{女性人口比例} (\text{女性指數}^{-1})] + [\text{男性人口比例} (\text{男性指數}^{-1})] \}^{-1}$$

政治和經濟參與及決策指數用其應的 EDEF 除以 50 得到。採用此種指數化方法的理由是：在一個理想社會，性別具有相同的賦權，性別賦權標準中的幾個變量應等於百分之五十；此亦即是，對每個變量，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應相等。

最後，對三個指數化的 EDEP 作簡單平均得到性別賦權標準。

性別賦權標準的計算：

以下根據委瑞拉的數據，來展示性別賦權標準的計算過程與結果。

計算議會代表的 EDEP

議會代表的 EDEP 值反映的是婦女在政治參與方面的相對賦權。根據一般公式，使用女性和男性在人口中的比例，以及女性和男性在議會席位中的百分比計算得到 EDEP 的值。

女性	男性
人口比例：0.497	人口比例：0.503
議會席位比例：9.7%	議會席位比例：90.3%
議會代表的 EDEP = $\{ [0.497 (9.7^{-1})] + [0.503 (90.3^{-1})] \}^{-1}$	
= 17.6	

議會代表指數化 EDEP = $17.6 / 50 = 0.352$

計算經濟參與的 EDEP

運用一般公式，分別計算女性和男性在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職位的百分比比例的 EDEP 值，以及女性和男性在專業和技術崗位上的百分比比例的 EDEP 值。這兩個計算值的簡單平均就是經濟參與的 EDEP 值。

女性

人口比例：0.497

議會席位比例：90.3%

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百分比：24.3%

專業和技術崗位上的百分比：57.6%

男性：

人口比例：0.503

議會席位比例：90.3%

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百分比：75.7%

專業和技術崗位上的百分比：42.4%

$$\text{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的 EDEP} = \{[0.497 (24.3^{-1})] + [0.503 (75.7^{-1})]\}^{-1} = 36.90$$

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的指數化 EDEP = 36.90/50 = 0.738

專業和技術崗位上的 EDEP = {[0.497 (57.6⁻¹)] + [0.503 (42.4⁻¹)]} ⁻¹ = 48.80

立法議員、高級官員和管理層職位的指數化 EDEP = 48.8/50 = 0.976

將兩個指數化後的 EDEP 進行平均 = (0.738 + 0.976) / 2 = 0.857

計算收入的 EDEP

分別估計女性和男性的所得收入(PPP 美元)，然後像計算人類發展指數和性別發展指數一樣，根據數值進行指數化。但是，在計算性別賦權標準時，收入指數基於未調整過的數值，未對估計所得收入取對數。

女性

男性

人口比例：0.497

人口比例：0.503

估計所得收入：3288 PPP 美元 估計所得收入：8021 PPP 美元

女性收入指數 = (3288 - 100) / (40000 - 100) = 0.080

男性收入指數 = (8021 - 100) / (40000 - 100) = 0.199

將女性和男性指數合併生成平均分佈指數：

$$\text{收入 EDEP} = \{[0.497 (0.080^{-1})] + [0.503 (0.199^{-1})]\}^{-1} = 0.114$$

在計算性別賦權標準方面，一旦性別賦權標準三方面的 EDEP 都計算出來後，則性別賦權標準的計算，就會變得相當簡單。其只是針對三個 EDEP 指數進行簡單的平均。

$$\text{GEM} = (0.352 + 0.857 + 0.114) / 3 = 0.441$$

第六節 小結

本章主要針對人類發展指數作了深入的介紹，並說明了人類發展指數乃是對人類發展成就的總體衡量。其主要測量的指標，包含了健康長壽的生活、成人識

字率、各級學校的綜合淨入學率，以及體面的生活水準等。經由對這些人類發展指數計算過程的了解，有助於我們明瞭人類發展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人類貧困指數的測量，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使我們了解人類預期壽命、識字率、受教育的機會，以及生活水準遭到剝奪的程度。同時，性別發展指數的衡量，亦指出了女性和男性在入學、就業、收入、識字率等方面的對照與百分比，並強調了女性獲得這些權利的重要性。至於在性別賦權標準方面，亦試圖突顯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的參與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些人類發展指數的衡量與重視，可以引導國際社會的了解特定國家在發展方面所遭遇到難題與困境，並進而提出因應與解決之道。

第七章 人類發展指數與國家分類

第一節 前言

由於人類發展指數有助於國際社會了解人類真正所面臨的發展困境，以及分析人類發展的進步或倒退情況，因此如何將全球各國家依據其人類發展指數進行排名，並根據每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比較分析各國的進展程度，促使各國政府重視該國人民的真正發展，實值得我們注意。因此，本章除了將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予以介紹外，並將就預期壽命、入學率和生活水準等方面，進行各國發展情勢的比較分析。此外，本章亦將從對人類貧困指數、性別發展指數和性別賦權標準的衡量，看出在國際社會中各個國家的排名次序，並以此作為各國政府繼續努力的目標。基本上，這些國家的排名，亦可能受到該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決定與解釋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排名先後。

第二節 人類發展指數國家排名

人類發展指數乃是對人類發展成就的一項總體性衡量指標，同時其也衡量出人類在健康長壽、知識和生活水準等方面的平均成就。根據表 5 的統計，我們發現挪威是排名全球第一位。從第一位到第廿四位的排名，幾乎都是全屬於經濟暨合作理事會的成員。此外，在分類方面，從第一位的挪威到第五十五名的墨西哥，都是屬於高人類發展水平。從第五十六名的安提阿到第一百四十一名的多哥，乃是屬於所謂的中等人類發展水平。最後，從一百四十二名的喀麥隆到一百七十五名的獅子山王國，皆屬於低人類發展水平。

表 5：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排名，2003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1	挪威	45	立陶宛	89	阿塞拜疆	133	史瓦濟蘭
2	冰島	46	科威特	90	約旦	134	葛摩伊
3	瑞典	47	克羅底亞	91	突尼西亞	135	寮國
4	澳洲	4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92	蓋亞那	136	不丹

5	荷蘭	49	巴哈馬	93	格林納達	137	賴索托
6	比利時	50	拉脫維亞	94	多米尼克	138	蘇丹
7	美國	51	聖基茲尼維斯	95	阿爾巴尼亞	139	孟加拉
8	加拿大	52	古巴	96	土耳其	140	剛果
9	日本	53	白俄羅斯	97	厄瓜多爾	141	多哥
10	瑞士	54	千里達	98	巴勒斯坦	142	喀麥隆
11	丹麥	55	墨西哥	99	斯里蘭卡	143	尼泊爾
12	愛爾蘭	56	安提阿	100	亞美尼亞	144	巴基斯坦
13	英國	57	保加利亞	101	烏茲別克斯坦	145	辛巴威
14	芬蘭	58	馬來西亞	102	吉爾吉斯斯坦	146	肯亞
15	盧森堡	59	巴拿馬	103	維德角	147	烏干達
16	奧地利	60	馬其頓	104	中國	148	葉門
17	法國	61	利比亞	105	薩爾瓦多	149	馬達加斯加
18	德國	62	模里西斯	106	伊朗	150	海地
19	西班牙	63	俄羅斯	107	阿爾及利亞	151	甘比亞
20	紐西蘭	64	哥倫比亞	108	摩爾多瓦	152	奈及利亞
21	義大利	65	巴西	109	越南	153	吉布提
22	以色列	66	波斯尼亞	110	敘利亞	154	茅利塔尼亞
23	葡萄牙	67	伯里斯	111	南非	155	厄利垂亞
24	希臘	68	多明尼加	112	印尼	156	塞內加爾
25	塞浦路斯	69	委內瑞拉	113	塔吉克斯坦	157	幾內亞

26	香港	70	西薩摩亞	114	玻利維亞	158	盧安達
27	巴貝多	71	聖露西亞	115	宏都拉斯	159	貝南
28	新加坡	72	羅馬尼亞	116	赤道幾內亞	160	坦尚尼亞
29	斯洛文尼亞	73	沙烏地阿拉伯	117	蒙古	161	象牙海岸
30	韓國	74	泰國	118	加彭	162	馬拉威
31	文萊	75	烏克蘭	119	瓜地馬拉	163	尚比亞
32	捷克	76	哈薩克斯坦	120	埃及	164	安哥拉
33	馬爾他	77	蘇利南	121	尼加拉瓜	165	查德
34	阿根廷	78	牙買加	122	聖多美	166	幾內亞比索
35	波蘭	79	阿曼	123	所羅門群島	167	剛果民主
36	塞席爾	80	聖文森	124	納米比亞	168	中非
37	巴林	81	斐濟	125	波札那	169	衣索比亞
38	匈牙利	82	秘魯	126	摩洛哥	170	莫三比克
39	斯洛伐克	83	黎巴嫩	127	印度	171	蒲隆地
40	烏拉圭	84	巴拉圭	128	萬那杜	172	馬利
41	愛沙尼亞	85	菲律賓	129	迦納	173	布吉納法索
42	哥斯大黎加	86	馬爾地夫	130	柬埔寨	174	尼日
43	智利	87	土庫曼斯坦	131	緬甸	175	獅子山共和國
44	卡達	88	格魯吉亞	132	巴布亞紐幾內亞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3).

就出生時的預期壽命而言，挪威在二〇〇一年的估計是七十八點七歲；但最高的預期壽命，則是出現在瑞典的七十九點九歲。在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範圍內，是巴哈馬的六十七點二歲。在中等人類發展水平方面，最高的出生預期壽命，是在牙買加的七十五點歲；最低的是在賴索托的卅八點六歲。最後，在低人類發展水平方面，最高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為六十點四歲，係出現在巴基斯坦；最低的卅三點四歲，則是非洲的尚比亞。整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為六十四點四歲，阿拉伯國家為六十六歲、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為六十九點五歲。至於南亞地區則為六十二點八歲，拉丁美洲為七十點三歲，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到四十六點五歲。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的預期壽命，則平均為七十七歲。此外，就整個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而言，平均預期壽命為七十七點一歲；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平均為六十七歲；而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平均則只有四十九點四歲。總體而言，全球的平均預期壽命，則為六十六點七歲。

在成人識字率(佔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方面，發展中國家為百分之七十四點五；低度發展國家為百分之五十三點三。以區域而論，中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家的識字率最高，約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三；其次則分別為拉丁美洲地區的百分之八十九點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百分之六十二點四。以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範圍來說，平均識字率為百分之七十八點一；其中以萬那杜的百分之卅十四為最低的國家。至於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則平均為百分之五十五，但最低的國家則為尼日的百分之十六點五。

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淨入學率方面，以經濟發展的程度而言，發展中國家為百分之六十，低度發展中國家為百分之四十三。以區域來看，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百分之八十一為最高，其次則為中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家的百分之七十九；再其次分別為東亞和太平洋區的百分之六十五、阿拉伯國家的百分之六十、南亞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四，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百分之四十四。此外，就人類發展水平的程度而言，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九；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平均則為百分之六十四；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則平均為百分之四十一。三者之間，實有相當大的落差。就全球層面而言，平均入學率則為百分之六十四。

第三節 人類貧困指數與發展中國家排名

雖然人類發展指數，可以讓我們觀察出人類發展的平均成就，但發展中國家的人類貧困指數，則有助於我們了解到，人類發展指數(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和生活水準)在這些國家的被剝奪的情況。

根據表 6，在發展中國家人類貧困指數的整體排名中，表現最好的是巴貝多，最差的則是尼日。在屬於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中，除巴貝多外，另

外還包含了新加坡、烏拉圭、哥斯大黎加、智利、古巴、千里達和墨西哥等。在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人類貧困指數低於百分之十的則有巴拿馬、哥倫比亞、伯里斯、委內瑞拉、牙買加、黎巴嫩和約旦國。同時人類貧困指數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則有波札那、東埔寨、寮國、賴索托和孟加拉等。此外，在屬於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卅四個國家中，最低的人類貧困指數為奈及利亞的百分卅四；最高的人類貧困指數，則為尼日的百分之六十一點八。

表 6：人類貧困指數與發展中國家排名, 2001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1	巴貝多	25	多米尼克	49	南非	73	東埔寨
2	烏拉圭	26	中國	50	阿曼	74	剛果民主
3	智利	27	玻利維亞	51	剛果	75	波札那
4	哥斯大黎加	28	菲律賓	52	蘇丹	76	塞內加爾
5	古巴	29	利比亞	53	印度	77	盧安達
6	新加坡	30	沙烏地阿拉伯	54	奈及利亞	78	象牙海岸
7	約旦	31	伊朗	55	吉布提	79	甘比亞
8	千里達	32	薩爾瓦多	56	摩洛哥	80	浦隆地
9	巴拿馬	33	印尼	57	馬達加斯加	81	貝南
10	哥倫比亞	34	斯里蘭卡	58	喀麥隆	82	馬拉威
11	委內瑞拉	35	敘利亞	59	坦尚尼亞	83	賴索托
12	伯里斯	36	蒙古	60	烏干達	84	幾內亞比索
13	墨西哥	37	突尼西亞	61	巴布亞紐幾內亞	85	中非
14	牙買加	38	宏都拉斯	62	納米比亞	86	茅利塔尼亞
15	黎巴嫩	39	越南	63	肯亞	87	莫三

							比克
16	巴拉圭	40	維德角	64	多哥	88	查德
17	模里西斯	41	斐濟	65	巴基斯坦	89	尚比亞
18	巴西	42	阿爾及利亞	66	寮國	90	辛巴威
19	秘魯	43	瓜地馬拉	67	葉門	91	馬利
20	馬爾地夫	44	尼加拉瓜	68	海地	92	衣索比亞
21	厄瓜多爾	45	緬甸	69	厄立垂亞	93	布吉納法索
22	土耳其	46	迦納	70	尼泊爾	94	尼日
23	蓋亞那	47	埃及	71	伊拉克		
24	泰國	48	葛摩伊	72	孟加拉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3).

在衡量人類貧困指數的四個指標上，即自出生起不能活到四十歲的比率、成人文盲率、無法持續獲得改善水源的人，以及五歲以上體重不足的兒童等，亦可觀察出開發中國家的一般趨勢。以自出生起不能活到四十歲的比率，根據表六我們可以發現，在屬於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廿個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巴哈馬一個國家的百分比為十六，其他國家則皆低於百分之十。在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表現較差的則為南非、納米比亞、波札那、史瓦濟蘭和賴索托等，其百分比皆超過了百分之四十。其中史瓦濟蘭和賴索托更分別高達了百分之七十點五和百分之六十八點一。儘管如此，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仍有卅二個國家的比值低於百分之十。這些國家分別為馬來西亞、巴拿馬、利比亞、模里西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西薩摩亞、聖露西亞、沙烏地阿拉伯、蘇利南、牙買加、阿曼、聖文森、斐濟、黎巴嫩、巴拉圭、菲律賓、約旦、突尼西斯、土耳其、斯里蘭卡、維德角、中國大陸、薩爾瓦多、伊朗、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埃及、所羅門群島、摩洛哥和萬那杜等。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的範疇上，百分比值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國家，則有盧安達、象牙海岸、馬拉威、尚比亞、中非、莫三比克、蒲隆地和獅子山王國等。其中，則以尚比亞的百分之七十點一為最驚人。

在成人文盲率方面，我們發現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百分比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有巴基斯坦、尼泊爾、葉門、甘比亞、茅利塔尼亞、貝南、象牙海岸、查德、幾內亞比索、中非、衣索比亞、莫三比克、蒲隆地、馬利、布吉納法索和尼日等。其中以甘比亞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二、塞內加爾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七、貝南的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幾內亞比索的百分之六十點四、馬利的百分之七

十三點六、布吉納法索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二，以及尼日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五的文盲率最為駭人。

在無法獲得改善水源的人口比率方面，我們也發現了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有馬達加斯加、海地、茅利塔尼亞、厄立垂亞、幾內亞、盧安達、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和布吉納法索等十個國家的百分比值，皆超過了百分之五十。此顯示該些國家的清潔水源和人體健康，正面臨重大的威脅。此外，在五歲以下體重不足兒童的比率方面，高於百分之四十的發展中國家，則有尼泊爾、葉門、厄立垂亞、衣索比亞、蒲隆地、馬利和尼日等。

最後在收入低於貧困線的人口方面，每日生活費低於一美元的人口比率，高於百分之六十的國家，則有烏干達、奈及利亞、尚比亞、衣索比亞、布吉納法索和尼日等。其中烏干達和衣索比亞的比例，更分別高達百分之八十二點二和百分之八十一點九。在收入低於每日二美元的國家中，有尼加拉瓜、烏干達、奈及利亞、衣索比亞和馬利等，百分比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此顯見這些國家的極度貧困狀態。此外，亦有孟加拉、尼泊爾、馬達加斯加、甘比亞、盧安達、尚比亞、蒲隆地、布吉納法索和尼日等國家，其百分比在百分之八十和八十九之間。

第四節 性別發展指數與國家排名

性別發展指數主要是反映在人類發展指數的三個指標中，即健康長壽的生活、識字率、入學率，以及所得收入等方面，在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不平等情況。在總體的性別發展指數上，根據表 7，可以看到從第一位的挪威到第五十二位的墨西哥，都是屬於所謂的高人類發展水平。從第五十三位的馬來西亞到第一百一十一位的剛果，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而從第一百一十二位的孟加拉到最後一位的尼日，則是屬於低人類發展水平的範圍。

根據二〇〇一年的資料統計，在預期壽命方面，高人類發展水平、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和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整體而言女性皆高於男性，其中的例外只有馬爾代夫、尼泊爾、巴基斯坦和辛巴威等。

表 7：性別發展指數與國家排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1	挪威	37	斯洛伐克	73	阿爾巴尼亞	109	寮國
2	冰島	38	愛沙尼亞	74	蓋亞那	110	賴索托
3	瑞典	39	烏拉圭	75	約旦	111	剛果
4	澳大利亞	40	巴林	76	突尼西斯	112	孟加拉

5	美國	41	哥斯大黎加	77	多米尼克	113	辛巴威
6	加拿大	42	立陶宛	78	亞美尼亞	114	喀麥隆
7	荷蘭	43	智利	79	烏茲別克斯坦	115	肯亞
8	比利時	44	克羅地亞	80	斯里蘭卡	116	蘇丹
9	丹麥	45	科威特	81	土耳其	117	烏干達
10	芬蘭	46	巴哈馬	82	維德角	118	多哥
11	英國	47	拉脫維亞	83	中國	119	尼泊爾
12	瑞士	48	白俄羅斯	84	厄瓜多爾	120	巴基斯坦
13	日本	4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85	薩爾瓦多	121	馬達加斯加
14	奧地利	50	千里達	86	伊朗	122	海地
15	德國	51	保加利亞	87	摩爾多瓦	123	甘比亞
16	愛爾蘭	52	墨西哥	88	阿爾及利亞	124	奈及利亞
17	法國	53	馬來西亞	89	越南	125	茅利塔尼亞
18	盧森堡	54	巴拿馬	90	南非	126	厄立垂亞
19	紐西蘭	55	哥倫比亞	91	印尼	127	葉門
20	西班牙	56	俄羅斯	92	塔吉克斯坦	128	塞內加爾
21	義大利	57	羅馬尼亞	93	敘利亞	129	盧安達
22	以色列	58	巴西	94	玻利維亞	130	坦尚尼亞
23	葡萄牙	59	模里西斯	95	蒙古	131	貝南
24	希臘	60	委內瑞拉	96	宏都拉斯	132	馬拉威

25	塞浦路斯	61	泰國	97	瓜地馬拉	133	尚比亞
26	香港	62	哈薩克斯坦	98	尼加拉瓜	134	象牙海岸
27	巴貝多	63	烏克蘭	99	埃及	135	查德
28	新加坡	64	伯里斯	100	納米比亞	136	剛果民主
29	斯洛文尼亞	65	牙買加	101	波札那	137	幾內亞比索
30	韓國	66	菲律賓	102	摩洛哥	138	中非
31	汶萊	67	斐濟	103	印度	139	衣索比亞
32	捷克	68	沙烏地阿拉伯	104	迦納	140	莫三比克
33	馬爾他	69	巴拉圭	105	柬埔寨	141	布隆地
34	阿根廷	70	黎巴嫩	106	巴布亞紐幾內亞	142	馬利
35	波蘭	71	阿曼	107	史瓦濟蘭	143	布吉納法索
36	匈牙利	72	秘魯	108	葛摩伊	144	尼日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3).

在成人識字率(占十五歲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方面，在屬於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即從第一位的挪威到第五十二位的墨西哥，男性和女性的識字率基本上是不分軒輊。但在從第五十三位的馬來西亞到第一百一十一位的剛果，這些國家皆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男性和女性識字率的百分比有擴大的現象，並開始呈現男性優於女性的現象。但其餘的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男性識字率的比重，則遠超過女性的比重。這些比較說明了，人類發展水平愈落後的地區，女性的教育機會愈受到了剝奪。

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綜合入學率方面，在已發展國家方面，男女性之間幾無所差別。在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亦無明顯的趨勢顯示出，男性或女性何者的入學率為高。但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則男性入學率優於女性的趨勢，已經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出。此再度說明了，在發展程度愈差的國家中，女性愈欠缺公平的教育機會。在個人收入方面，男性的收入顯然皆高於女性。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和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男性和女性收入差異的比重更大。

第五節 性別賦權標準與國家排名

性別賦權標準所探討的是婦女的機會而非能力，因此其所欲觀察的指標，分別為女性的政治參與和決策權力、經濟參與和決策權力，以及婦女對經濟資源的支配權等。根據表 8，就總體性的觀察而言，在性別賦權標準的國家排名方面，乃是以冰島居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排名第四十四位，此顯示出日本的婦女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參與，在與其他國家比較之下，其比重並不高。最後十名分別為烏克蘭、格魯吉亞、韓國、柬埔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土耳其、斯里蘭卡、埃及、孟加拉和葉門等。這些數據指出了在這些國家中，女性參與的角色依然有待加強。

表 8：性別賦權標準與國家排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名次	國名
1	冰島	19	哥斯大黎加	37	多米尼克	55	泰國
2	挪威	20	巴貝多	38	玻利維亞	56	委內瑞拉
3	瑞典	21	葡萄牙	39	秘魯	57	俄羅斯
4	丹麥	22	千里達	40	希臘	58	巴基斯坦
5	芬蘭	23	以色列	41	匈牙利	59	巴拉圭
6	荷蘭	24	斯洛伐克	42	烏拉圭	60	宏都拉斯
7	奧地利	25	波蘭	43	墨西哥	61	烏克蘭
8	德國	26	新加坡	44	日本	62	格魯吉亞
9	加拿大	27	斯洛文尼亞	45	馬來西亞	63	韓國
10	美國	28	捷克	46	哥倫比亞	64	柬埔寨
11	澳大利亞	29	納米比亞	47	伯里斯	6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2	紐西蘭	30	拉脫維亞	48	立陶宛	66	土耳其
13	瑞士	31	波札那	49	厄瓜多爾	67	斯里蘭卡

14	西班牙	32	義大利	50	巴拿馬	68	埃及
15	比利時	33	愛沙尼亞	51	智利	69	孟加拉
16	愛爾蘭	34	塞浦路斯	52	摩爾瓦多	70	葉門
17	英國	35	菲律賓	53	羅馬尼亞		
18	巴哈馬	36	克羅地亞	54	薩爾瓦多		

資料來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3).

婦女在議會中的席位，以百分比來看，可以觀察到以瑞典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三為最高。此外，百分比超過卅的國家，則有挪威、冰島、荷蘭、丹麥、芬蘭、奧地利、德國、阿根廷、哥斯大黎加和古巴等國。婦女在議會席次比重，低於百分之十的國家，則有韓國、巴林、匈牙利、安提阿、巴拿馬、模里西斯、俄羅斯、巴西、委內瑞拉、西薩摩亞、羅馬尼亞、泰國、烏克蘭、哈薩克斯坦、斐濟、黎巴嫩、巴拉圭、馬爾代夫、格魯吉亞、約旦、阿爾巴尼亞、土耳其、斯里蘭卡、亞美尼亞、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薩爾瓦多、伊朗、印尼、赤道幾內亞、瓜地馬拉、埃及、聖多美、摩洛哥、印度、萬那杜、迦納、柬埔寨、巴布亞紐幾內亞、史瓦濟蘭、不丹、孟加拉、多哥、喀麥隆、尼泊爾、肯亞、葉門、馬達加斯加、海地、奈及利亞、茅利塔尼亞、貝南、馬拉威、查德、幾內亞比索、中非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和尼日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婦女議會席次的比重，約為百分之廿一點八。而婦女議會席位比率最低的國家則為阿拉伯的葉門，其百分比為零點七。

在女性立法人員、高級官員和管理人員的比率方面，在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其比率多高於百分之廿。但在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則平均與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不相上下。但在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和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中，所發現的一個普遍現象在於數據的不可得，此顯示出女性官員的比例應該是相當的低。

在女性對男性收入估計數之比方面，我們發現的一個共同趨勢，即在於男性的平均收入，均高於女性。在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中，此一比重約為零點五以上。麥女性對男性收入的估計數，更高達了零點七一。但在屬於中等人類水平的國家中，此一比率最低已降到伯利斯的零點二四。在工作方面，無論是受到文化，或不公平工作機會的影響，均已然使得女性的收入不如男性。

在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女性的識字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一。在低度發展國家中，女性的識字率則更降到百分之四十三點八。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女性的識字率則

分別高達百分之八十一點三和百分之八十八點二。中東歐和中亞獨立國協的女性識字率，更是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但在南亞地區的女性識字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點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亦只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五。此外，就整個中等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而論，此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但在低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此比率則降到百分之四十四點四。

在經濟活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可由女性經濟活動的參與率中看出。在整體的發展中國家中，女性經濟活動的參與率，約為百分之五十五點七。其中以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表現最好，其比例約為百分之六十八點八；其次則為南亞地區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以及阿拉伯國家的百分之卅二點七。不過，就整個不同程度的人類發展水平來看，每一個範圍的平均比重，皆約為百分之五十多。全世界的女性經濟活動參與率，則約為百分之五十五點二。至於參與率低於百分之卅的個別國家，則有馬爾他、模里西斯、伯里斯、阿曼、伊朗、敘利亞和約旦等。

第六節 小結

根據聯合國所界定的所謂發展中國家，共有一百卅七個；低度發展國家則有四十九個之多。而屬於高收入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則共有廿四個國家。這些類別國家的區分，主要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個人平均所得決定之。但若根據人類發展指數的衡量，我們可以發現共有五十五個國家屬於所謂的高度人類發展水平，而其中有阿根廷、巴哈馬、巴林、巴貝多、白俄羅斯、汶萊、智利、哥斯大黎加、克羅地亞、古巴、塞普路斯、捷克、愛沙尼亞、中國大陸、匈牙利、以色列、韓國、科威特、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墨西哥、波蘭、卡達、新加坡、斯洛伐克、千里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拉圭和塞席爾等國家，卻都是屬於發展中國家。此一研究發現，指出了每一個國家皆有屬於自己本身的發展議題，且每一個國家的發展背景亦有所差異。易言之，人類收入的差異性，及其所象徵的貧富程度，亦因所處國家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例如，雖然在人類發展指數、人類貧困指數和性別發展指數方面，已發展國家的表現皆強於發展中國家。但在性別賦權標準的觀察上，我們卻可發現一些經濟發展極為優秀的國家，如日本和韓國等，皆僅分別排名全球的第四十四位和第六十三位。此一結果說明了傳統文化的因素，不但影響到了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參與，並亦推翻了個人收入的高低，與人類發展指數的存在正面關係。

第八章 結論

根據聯合國發展計畫署在二〇〇二年所提出的人類發展報告，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是零點九零二，在全球排名第廿六位，而中國大陸僅排名在第九十五位；因此，在聯合國的定義中，台灣屬於高度人類發展的國家。二〇〇二年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比其在一九九〇年進步了四名，但卻比二〇〇一年退步了兩名。由於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國際社會表現相當優越，因此爲了提升台灣國際形象，政府與民間應該加強對台灣人類發展議題的介紹與分析，使國際社會得以了解台灣的正面發展情況。

首先，值得台灣注意的是，聯合國所謂的人類發展報告理論，已開始影響到國家層面，因此一些以國家爲單位的國家人類發展報告(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亦開始出爐。迄目前爲止，除了十份的區域報告外，已經有超過一百卅五個國家，以及超過三百七十五本以上的國家和次國家層面的人類發展報告問世。根據這些報告的發行，可以看出人類發展概念已傳播到國家政策的對話中，不僅是透過人類發展指標和政策建議，而且也經由國家本身所領導的研究和撰寫。關於地理區位、種族團體，以及城鄉發展等國家層面統計資料的介紹，有助於各個國家的解決內在發展問題，遏阻可能的潛在衝突。這些國家層面的人類發展報告，不僅可激勵公開的討論，而且也可動員民眾對人類發展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這些報告亦反映了地方人民的真正認知與優先需要，並進而改變國家的傳統發展政策。

在全球層面上，人類發展報告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已經出版了十五期，包含了許多重要的人類發展議題。根據表 9，每一期人類發展議題的變化，說明了當年度國際社會所重視的發展議題何在。對這些議題演變的強調與重視，亦可使台灣政府與民間了解到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並協助推動台灣擬訂相關的人類發展政策。此外，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於政府與民間近年來均不斷致力推動重返國際社會，尤其是參與聯合國的活動，更是我們的重要目標之一。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蓬勃發展，已然是近幾年來的普遍現象。對於每一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所出版的發展議題，不但有其人類發展的重大意涵，而且也提供了我國政府與民間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的重要指標。由於每一年的人類發展報告出版後，必然引起國際社會、區域、國家政府，以及民間非政府組織的重視，因此我國政府和民間倘能利用當年的特定人類發展議題，積極研究和探討台灣於此一議題上的發展，以及思考如何與其他國家建立國際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並進而協助其他第三世界國解決發展的問題，必然能引起國際社會的正面肯定與回應。

表 9：人類發展報告與發展議題，1990-2004

人類發展報告出版年代	主要議題
------------	------

1990	人類發展的概念和測量
1991	人類發展的財政資源
1992	人類發展的全球層面
1993	人民的參與
1994	人類安全的新層面
1995	性別和人類發展
1996	經濟成長和人類發展
1997	消滅貧窮的人類發展
1998	消費與人類發展
1999	人類發展的全球化
2000	人權和人類發展
2001	建構人類發展的新科技工作
2002	強化分裂世界的民主深化
2003	國家終結人類貧窮的協定
2004	今日多樣世界的文化自由

資料來源：http://hdr.undp.org/reports/view_reports.cfm?type=1

除了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每年定期出版人類發展報告外，許多有關人類發展議題的區域報告，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即已不斷獲得重視與出版。根據表 10，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少屬於區域性的人類發展報告問世。這些區域報告主要集中在南亞、東歐、太平洋、南部非洲和中美洲等地區。由此可以看出，在區域層面的人類發展議題，亦已引起廣泛的重視。近幾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民主的深化，人類發展的問題在台灣已獲得重大的改善。因此，如何在區域層面加強台灣的貢獻和影響力，應該是台灣政府和民間未來可以努力的空間。爲了要達到這些目標，台灣的政府相關單位和民間組織，似可適時召開區域性的國際會議，就人類發展議題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流、問題探討與分析，以及解決方案的擬訂。這些區域性會議的召開，可使國際社會了解到台灣對人類發展議題所作出的貢獻。

其次，更值得台灣政府與民間努力的方向，則是應設立相關基金，延攬重要國內外學者和專家，針對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亞太地區等的區域人類發展議題，進行計畫的研究與撰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計畫的完成，可以同時採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使用中文撰寫的計畫，可在國內出版，藉以喚起國人對台灣和區域發展議題的重視。對於使用英文撰寫的計畫，則可委託國外重要出版社出版之，俾使此一有關台灣和區域發展之書籍，得以在國際社會廣泛流傳，以提高台灣在國際社對的形象。此外，利用在台灣或在國外召開國際發展會議的機會，蒐集與會人士的論文，加以編輯成英文書籍，使台灣的發展進程，獲得更多國際社會的認識與了解。

表 10：人類發展區域報告

出版年代	區域名稱	報告名稱
2004	東歐	中東歐和獨立國協的愛滋病毒和人類發展(HIV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003	阿拉伯國家	2003 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建立一個知識的社會(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2003	東歐	避免依賴的陷阱：洛馬人類發展報告(Avoiding the Dependency Trap: The Rom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南亞	2003 南亞的愛滋病毒/愛滋病和發展(HIV/AIDS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2003)
2002	阿拉伯國家	2002 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為未來世代創造機會(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2002	加勒比海地區	東加勒比海國家組織的人類發展報告：建立在弱點之上的競爭力(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 Build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ace of vulnerability)
2002	中美洲	中美洲和巴拿馬：區域的形勢分析(Central America and Panama: The State of the

		Region)
2002	南亞	2002 南亞人類發展：農業和農村發展(Human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2002: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01	南亞	全球化和人類發展(Globaliz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0	南亞	南亞的人類發展：性別問題(Human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The Gender Question)
2000	南部非洲	SADC 區域人類發展報告(SADC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中美洲	人類發展的區域情勢(State of the Region in Human Development)
1999	東歐	一九九九年的轉型：轉型的人類代價：東南歐的人類安全(Transition 1999: The Human Cost of Transition: Human Security in South East Europe)
1999	太平洋地區	創造機會(Creating Opportunities)
1999	南亞	治理的危機(The Crisis of Governance)
1998	東歐	轉型中的貧窮(Poverty in Transition)
1998	南亞	教育的挑戰(The Education Challenge)
1998	南部非洲	南部非洲的治理和人類發展(Governa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
1997	東歐	縮小的國家：治理和永續人

		類發展(The Shrinking Stat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Human Government)
1997	南亞	人類發展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Human Development)
1996	東歐	轉型中的人類居所：以東歐和獨立國協為例(Human Settlements under Transition: The Case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IS)
1995	東歐	性別和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1995	西非	貧窮和人類發展(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94	太平洋地區	一般人類發展報告(Gener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資料來源：http://hdr.undp.org/reports/views_reports.cfm?type=2

由於人類發展報告已經在國際和區域層面，獲得廣泛的迴響，因此許多國家政府亦已開始重視人類發展議題，紛紛撰寫各國國別的人類發展報告，此顯示了各國政府對人類發展的重視與強調。例如，波札那在公元兩千年所提出的報告，即要求全力預防和治療愛滋病；保加利亞在公元兩千年的報告，亦在該國的二百六十二個城市地區，進行了社會和經濟情勢的分析，俾作為提供小型企業的工作機會。同時，印度政府在近年來亦已強調人類發展的重要性，並使該議題成為政府政治對話的重心。一九九九年的菲律賓報告，亦強調了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性。

由這些國別發展報告可以觀察出，人類發展的議題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所注意的焦點。一個國家的發展，若未能顧及真正以人為本的發展，則此一發展必然並非有實質意義的發展。由於人類發展議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各國政府在呼應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之下，亦開始強調各國人類發展的特殊性。整體言之，撰寫國別報告的國家數目，已經超過了百餘國，而其主題亦包括如下各項：公民社會、地方分權化、民主政治、經濟危機、經濟成長、經濟改革、教育、就業、環境、糧食安全、性別、全球化、治理、健康、愛滋病/愛滋病毒、人權、不平等、千年發展目標、參與、和平與安全、貧窮、區域和農村發展、國家的角色、科學和技術、社會團結、永續人類，以及青年議題等。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發展議題對台灣而言實具相當之重要性。由於台灣如何走向國際社會，或如何與國際社會接軌，一直是政府與民間所關切的議題，因此

台灣方面如何利用國際社會所重視的這些發展議題，研擬出真正屬於台灣的人類發展報告，才是我們所應該努力完成的目標。例如，人權、永續發展、婦女、青年、就業、醫療和教育等議題，一直是台灣政府與民間所重視者，因此如何有系統的委託學術單位撰寫上述相關議題，則將使台灣的發展成果，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更有甚者，有關台灣發展議題報告的問世，將亦有助於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向聯合國提供了寶貴的台灣發展資料，此不但符合聯合國的期望，亦必然使得台灣的進步情況，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爲了要使台灣政府相關單位和民間組織，了解上述發展議題的重要性，政府應有計畫的委託學術單位辦理這些議題的研討會或教育訓練研習班，以加強國內對這些議題的認識與了解；此不僅有助於國內改善人民所面臨的發展處境，亦可強化台灣與國際主流價值的合而爲一。更重要的是，政府相關單位應委託學術單位，就不同的專業議題，如婦女、青年、人權、永續發展、消滅貧窮等，分別召集相關的民間非政府組織，進行教育訓練與研討。此一作法不但可強化這些民間組織的能力建構，並亦可促使其與國際主流價值接軌，並對國際社會作出更積極與更正面的貢獻。

參考書目

- 林德昌，「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發展合作：建構台灣援外的新框架，」*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4 年一月)：73-102。
- 林德昌編著，*非政府組織*。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民國九十一年。
- 林德昌編著，*台灣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參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二年)。
- 林德昌，*海峽兩岸援外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
- 林德昌，*廣東與四川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九十年。
- 范麗珠主編，*全球化下的社會變遷與非政府組織*。上海：人民初版社，2003 年。
- 環球計畫：人道主義憲章與賑災救助準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一年。
- Abbot, Kenneth W. and Duncan Snidal,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edited by Paul F. Diehl.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 Addison, Tony. "Aid and Conflict,"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 Adelman, Irm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 Allenby, B., I. Yasui, M. Lehn, R. Züst and D. Hunkeler, "Econometrics Stakeholder Subjectivity: Values, Issues and Effects," *Environmental Quality Management*, Vol. 8, no 1 (1998): 1-18.
- Allison, Adrienne A. and Lily P. Kak. "NGO/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in Mater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s*, no 3 (1992): 163-166.
- Almond, Gabriel A.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 Amin, Samir.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Anderson, Mary B. *Do No Harm: How Aid Can Support Peace or W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 Anderson, Mary B. and Woodrow, Peter J. *Rising from The Ash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imes of Disaster*. Boulder: Lynner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Bebbington, Anthony and John Farrington, "Government, NGO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9 no 2 (1993): 203.
- Bell, Simon and Stephen Morse,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Learning from Doing*.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3.
- Biggs, Stephen D. and Arthur D. Neame. "Negotiating Room to Maneuver:

- Reflections Concerning NGO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New Policy Agenda,” in *Beyond the Magic Bullet: NG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Edwards and David Hulme.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1996.
- Birl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conomic Research Division, *Does Foreign Aid Help?*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1.
- Black, C.E.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 Blair, Harry. “Civil Society and Build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Donor Experience,” in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Amanda Bernard, Henny Helmich and Percy B. Lehning. Paris: OECD, 1998.
- Bluestone, Barry.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III (Fall 1972): 65-82.
- Boone, Peter and Jean-Paul Faguet. “Multilateral Aid, Politics, and Poverty: Past Failur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Crisis in Foreign Aid*, ed., by Richard Grant and Jan Nijm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 (July-August, 1972): 83-95.
- Chilcote, Ronald H.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 Clark, John,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Inc., 1991.
- Curwell, S. and I. Cooper, “The Implications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Vol. 26, no 1 (1998): 17-28.
- DAC,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Aid*. Paris: OCED, 1992.
- Dahl, A. L. “The Big Pictu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in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 Report on the Project on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ited by B. Moldan, S. Billharz and R. Matravers. Chichester: Johy Wiley and Sons, 1997, 69-83.
- Eade, Deborah. *Capacity-Building: An Approach to People-Centred Development*. Oxford: Oxfam, 1997.
- Edwards, Michael and Hulme, David. *Beyond the Magic Bullet: NG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Inc., 1996.
- Fisher, Julie. *Non-Governments: 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1998.
- Fowler, Alan. *The Virtuous Spiral: A Guide to Sustainability for NGO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0.
- Fowler, Alan. “The Role of NGOs in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no 9 (1991): 53-84.
- Fox, Jonathan and Hernandez Luis, “Mexico’s Difficult Democracy: Grassroots Movements, NGOs and Local Government,” *Alternatives*, no 17 (1992): 165-208.
- Frank, Andre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XVIII (September 1966): 17-31.
- Garcia, S. M. and D. J. Staples. “Sustainability Reference Systems and Indicators for Responsible Marine Capture Fisheries: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 Elements for a Set of Guidelines,” *Marine and Freshwater Research*, Vol. 51, no 5 (2000): 385-426.
- Gariyo, Zie. “NGOs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in *Beyond the Magic Bullet: NGO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Edwards and David Hulme.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6.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Goodland, R. and H. Dal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niversal and Non-Negotiable,”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Vol. 6, no 4 (1996): 1002-1017.
- Healey, John and Tony Killick. “Using Aid to Reduce Poverty,”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i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edited by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Held, Davi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eltberg, Rasmus and Uffe Neilsen, “Foreign Aid,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 Howell, Jude. “NGO-State Relations in Post-Mao China,” in *NGOs, States and Donors: Too Close for Comfort?*, edited by David Hulme and Michael Edward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 Hulme, David and Edwards, Michael, ed., *NGOs, States and Donors: Too Close for Comfor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7.
-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XVII (April: 1965): 386-430.
-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InterAction, *Enhancing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2001.
- Johnson, Willard R. and Vivian Johnson, *West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Volunte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 Kaplan, Allan.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as a Living Process,” in *New Roles and Relevance: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edited by David Lewis and Tina Wallace. Bollmfield: Kumarian Press, Inc., 2000.
- Keohane, Robert O. *Power and Government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Kjaer, Anne Mette. *Governance*. Malden: Polity Press, 2004.
- Krasner, Stephen D.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ited by Stephen D. Kras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5.
- Kruijf, H. A. M. de and D. P. van Vuuren, “Follow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lations to the North-South Dialogue: 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Vol. 40 (1998): 4-14.
- Lancaster, Carol and Wangwe, Samuel. *Managing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Aid Dependence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2000.

- Lancaster, Carol. *Transforming Foreign Aid: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 _____. *Aid to Africa: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Done*. Chicago: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
- Lewis, David and Wallace, Tina, ed., *New Roles and Relevance: 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Inc., 2000.
- Lin, Teh-chang. "The Donor versus the Recipient Approach: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Aid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aipei and Beijing," *Asian Perspectives*, Vol. 24, no 2 (2000): 153-171.
- Lindenberg, Marc and Bryant, Coralie. *Going Global: Transforming Relief and Development NGOs*.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Inc., 2001.
- 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III (March 1959): 69-105.
- Meter, K. *Neighbourhoo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Guidebook*. Minneapolis: Crossroads Resource Center, 1999.
- Mikesell, Raymond.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Aid*. Chicago: Aldine, 1968.
- Mitlin, Diana. "The NGO Sector and its Role in Strengthening Civil Society and Securing Good Governance," in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Amanda Bernard, Henny Helmich and Percy B. Lehning. Paris: OECD, 1998.
- Morgan, Lynn 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in Costa Ric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no 30 (1990): 211-219.
- Muscat, Robert J. *Investing in Peace: How Development Aid Can Prevent or Promote Conflict*. New York: Armonk, 2002.
- Myrdahl, Gunnar.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 Najam, Adil. "Understanding the Third Sector: Revisiting the Prince, the Merchant, and the Citizen,"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vol. 7, no 2 (1996): 203-219.
- Nelson, Paul J. *The World Bank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Limits of A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 Nye, Joseph S. and Donahue, John D. e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 OECD. *Development 1999 Report: Efforts and Polici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Paris: OCED, 2000.
- OECD.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view Series, 1998*. Paris: OCED, 1998.
- Organki, A.F.K.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 Paz, L. Arizpe and M. Belazquez, *Culture and Global Change: Social Perceptions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Lacandona Rain Fores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 Pearce, Jenny, "Developmen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the Debate and Its Future,"

- in *Developmen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Deborah Eade (London: Oxfam, 2000), 16-17.
- Pearce, Jenny. *Developmen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am GB, 2000.
- Pye, Lucia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CCCLVIII (March 1965): 3-13.
- Richey, Lisa Ann. "Gender Equality and Foreign Aid," in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Finn Tarp. London: Routledge, 2000.
- Riker, James V. "From Cooptation to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Toward an Enabling Policy Environment for Asia*, edited by Noeleen Heyzer, James V. Riker and Antonio Quiz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_____.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6.
- Riley, John M. *Stakeholders in Rural Development: Critical Collaboration in State-NGO Partnership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2.
- Rostow, Walt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Rotmans, J. and M. B. A. van Asselt, "Perspective on a Sustainabl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 no 2 (1999): 201-230.
- Salamon, Lester M. *America's Nonprofit Sector: A Primer*.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99.
- Staniland, Martin.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pero, Joan Edelma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0.
- Stiglitz, Joseph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
- Tandon, Rajesh. *NGO Government Relations: A Source of Life or a Kiss of Death*. New Delhi: Society fo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Asia, 1989.
- Tandon, Rajesh and K. Naidoo, "The Promise of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edited by Rajesh Tandon. West Harford: Kumarian Press, 1999.
- Taylor, Jer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Model for China?" in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James A. Dorn.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8.
- Theunis, Sief. ed. *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2.
- Tvedt, Terje. *Angels of Mercy or Development Diplomats?: NGOs and Foreign Aid*. Oxford: James Curry, 1998.
- WCED,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est, Katarina. *Agents of Altruism: The Expansion of Humanitarian NGOs in Rwanda and Afghanista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0.
- Wuthnow, Robert.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Zartman, I. William.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